

鹿寨文史资料

第十辑

柳江

回眸多少感慨事

风物长宜放眼量

政协鹿寨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委会

《鹿寨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主任：郑一鸣

副主任：覃清培

编委：刘华桂

韦乾林

刘克林

刘江平

黎耘（特邀）

《鹿寨文史资料·第10辑》

内容简介

2009年，为庆祝全国政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政协鹿寨县委员会赶在8月出版《鹿寨文史资料·第十辑》

本辑开设了《烽火岁月》、《沧海桑田》、《杏林春秋》、《青春留痕》、《文物古迹》等栏目。

曾设想分行业编成专辑，首先在卫生战线作试点，经几次会议动员、组稿，知情者亦积极投稿，但总感内容单薄，没有压轴之作，无法成册，只能编成偏重卫生战线的一辑，。

《潜伏机场的战斗》为本辑重点文章，作者谢仲，鹿寨政协离休的老主席。他的英雄事迹、荣获勋章，少有人知，包括他的儿孙辈。

目 录

◇烽火岁月◇

- 潜伏机场的战斗·····谢 仲
暴乱与灭亡
——鹿寨全境剿匪斗争纪实·····吴 狄
袭击日军军车·····林老义 廖鸿仁 廖国佑 / 口述 林桎华 / 记录整理
中渡剿匪岁月漫忆·····谢永宁

◇沧海桑田◇

- 鹿寨县十大水利工程·····沈光明
鹿寨县的两次水利建设高潮·····蔡传清
鹿寨县解放后水稻生产史上的两次失误·····蔡传清
鹿寨县水稻品种改良记·····沈光明 / 整理
鹿寨县农具革新录·····沈光明 / 整理

◇杏林春秋◇

- 鹿寨县人民政府卫生科（局）体制变更概况·····汤英能 覃德礼 / 供稿
鹿寨县区、乡（镇、社）卫生院（所）机构变更概况·····覃德礼 / 供稿
雒容联合诊所的变迁·····彭卓越
黄冕乡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期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韦德昌
艰苦奋斗建医院·····李开鑫
平山卫生院由“所”到“院”的发展·····李开鑫
去黄冕普种牛痘·····刘仕金
我县发现的第一例血丝虫病·····韦德昌
鹿寨县麻风病流行简述·····覃德礼
检送麻风病人·····刘仕金
县医院下设四个分院的历史背景·····韦德昌
用“大力丸”治疗“新四病”·····刘仕金
我县的首次兵役体检·····廖建桃
回忆推行新法接生的艰辛岁月·····刘凤珠 / 口述 覃德礼 / 记录整理
鹿寨县“钢铁野战医院”·····韦德昌
黄腊“炼铁基地”的医疗保健工作·····邵世周
建国十周年赴南宁参观团·····李开鑫

◇青春留痕◇

- 从一张老照片勾出的记忆·····路 德

◇文物古迹◇

再话洛容“平蛮碑”黄小斌
巴敢岩奇境.....李宝璜

潜伏机场的战斗

●谢 仲

一枚闪闪发光的
解放华中南纪念章
千万英雄儿女
捐血肉铸造
珍藏整整六十个春秋
牵引着一条条神经
我不得不说
那场潜伏机场的战斗——

1949年4月，解放大军势如破竹，突破长江天险，挥师南下，全国解放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国民党桂系反动头目们溃退广西，负隅顽抗，与地方政客相互勾结，不择手段实行联保、宵禁，随处捕杀无辜，白色恐怖至极。柳州地下党城工委分析了当前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果断地采取了从政治上组织强大的攻势，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动员一切可以运用的力量，深入军、政、工等部门，进行有力的反击。

求职试锋芒

7月初，正值学校放暑假，身为龙城中学学生的地下党员罗鸿坤和我，向柳州地下党城工委请战，要求投入更为激烈的战斗行列。胡习恒是罗鸿坤的直接领导人，经过分析利弊，觉得很有必要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柳州飞机场驻扎着国民党空军第二七三供应中队，由于我解放大军势不可挡，机场里不时有士兵私自逃离，另谋生路，致使机场人员紧缺，我们可以利用学生身份前往求职，打入机场内部。他代表地下党组织，批准了罗鸿坤和我组成潜入柳州飞机场的二人战斗小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为解放柳州做好充分准备。

胡习恒交代完任务，拍着我和罗鸿坤的肩头，神色凝重地说：“军用机场是个警戒级别极高的场所，敌人的防卫意识也不一般。你们两个都是学生哥，要与那群老奸巨猾的家伙直接战斗，危险很多。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帮忙吗？”罗鸿坤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回答十分干脆：“只要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胆子就大，勇气就足，天大的问题都难不倒我们。”胡习恒点了点头，说：“好样的，你们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吧！”

潜伏到机场去，这话好说，可我和罗鸿坤眼下连一点门路也没有，只好试着去探探“行情”。7月25日，我俩来到飞机场入口处，就碰了钉子——卫兵把枪一横，要我们出示证件。我们把前来求职的话说了一大堆，那卫兵就是不肯放行。没办法，我们只好掉头离去。两人回到柳江边的浮桥头附近，突然发现那里停着一辆空军司令部的汽车。一打听，知道这是接送机场员工的专车。我们观察了好一阵，见既没有人收钱，也不验证，便鼓起胆量，登车再说！万幸的是，我们总算找到了敌人的破绽，随车驶进了飞机

场。

来到机场，我和罗鸿坤不知天高地厚，径直闯进了基地分队长的办公室。分队长是个个头高大的“独眼龙”，听说我俩是来求职的龙城中学学生，用一只眼朝我们上下扫视了好一阵，然后态度十分淡漠地来回踱步。突然，他官腔十足地厉声喝问：“求职？嗯？既然你们说是龙中的学生，我倒想听听你们对五月闹事的看法。”

“独眼龙”说的“五月闹事”，指的是不久前发生的龙城中学的“寻师运动”：5月19日，龙中的5名党员教师接到上级指示，紧急撤退。地下党组织为了掩护他们，把撤离说成是受国民党特务迫害而“失踪”，组织学生寻找“失踪”教师，并在《广西日报》上巧妙地利用广告形式，刊登了5位教师“失踪”的消息。这事闹得国民党特务系统晕头转向，党员老师趁机安全转移。

“独眼龙”的“敲山震虎”，并没有威慑力，我们在出发前就对这个问题有所预料。罗鸿坤沉着应对，说：“报告长官，说我们学校的学生五月闹事，不过是因为老师‘失踪’了，课堂上没老师上课，乱哄哄的，学校又管不着，学生只好到政府、到警备司令部去查询。请问这能算是学生闹事吗？再说，《广西日报》是省府报纸，曾在第四版头条新闻刊登了龙中学生‘寻师’之举，字里行间充满了理解和同情，不知长官何以独断，用‘闹事’一词呢？长官如果健忘，不妨找5月25日的《广西日报》细看。”

我见“独眼龙”一时语结，也不甘示弱地说：“我们龙中学生，自幼至今，在家孝敬长辈，在校尊敬师长，勤学、守纪、尊师，为柳州广大民众津津乐道。师长突然‘失踪’，学生采取‘寻师’善举，其心拳拳，其情殷殷。假若真个闹事，今天恐怕就没有这么太平了！”

罗鸿坤和我的一番话，不卑不亢，说得“独眼龙”自知理亏。一旁的一位副官替他解围，和他小声地嘀咕了一阵子，他的傲慢神态才有了转变。我听到了他对副官说：“正值急着用人之时……谅这两条小鱼仔也翻不起大浪！”副官这才向我和罗鸿坤招手，让座。又经过一番交谈，我俩终于闯破“山门”，被录用了。

浅滩捞大鱼

罗鸿坤和我被批准入伍后，分配在军需室当上了中士文书。对此，我俩是忧喜参半。喜的是，我们总算插足在机场这块神秘的土地，有了活动空间；忧的是，因为我们打进机场内部的首选是基地的文书室，却被分到只管钱物后勤的军需室这个“浅滩”，深怕捞不到“大鱼”，搞不到重要情报。不是说军需室不重要，但文书室是机场综合性的办公场所，人员往来，交接频繁，更是收发文件的重地，在这里更容易搞到机密情报。况且，据我观察，分队长“独眼龙”性格暴戾，十分狡诈多疑，难保他对龙中来的求职学生不存戒心，只不过因为人手实在紧缺，权且将我们拿来“塞萝卜眼”使用罢了！或许，他有意将我们“录用”，为的是发现蛛丝马迹，抓住“共党分子”，以图升官发财呢！

不过，我们在军需室的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埋头苦干，口不乱开，绝不做“出格”之事，好一副“遵纪守法”的样子，暗地里却下定决心，要在这“浅水滩”捞到“大鱼”。

一天，军需官审核完机场发薪人员名单和金额之后，要我和罗鸿坤依样画葫芦，重新造册。我俩把册子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之后，心中暗喜：这绝不是普通的领薪花名册，确切地说，它是机场内部人事分部档案册，有极重要的情报价值。因为每个大小部门都是独立造册的，人员都按各自的职务高低领取薪水；部门头头的级别高低，人员在编配备多少，意味着这个单位的重要程度，通过分析，就能将机场内部的政治、军事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

但是，要弄到这许多资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稍有不慎，露出马脚，就会引来杀

身之祸。这本花名册，虽是领薪的一个凭证，人人都看得见，摸得着，发完薪也就无多大价值了，但假若你想复制一份，那是绝不允许的。所以说，这本花名册，是个既公开而又机密的东西。

罗鸿坤和我心领神会，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就开始在军需官的眼皮底下“依样画葫芦”了。我俩采取明造册、暗统计、重点录取的做法，造册时故意出现一些“错漏”，这样，废纸篓里的“废纸”也就多了。下班后，我们又慢慢地清理那些宝贵的“废品”，时间也就延误了不少。为此，一位军需官训斥我们：“这么简单的册子还造不好，白吃干饭啊！还要弄多久啊？”我赶忙起立报告：“请长官原谅，我们两个第一次干这一行，总怕出了差错，所以手脚慢点。不过，请长官放心，我们保证今天一定能够干完。”

之后，我们用了两天时间，将摘录的零散资料拼凑整理，机场内所有的“大鱼”几乎全囊括在我们的“网”中。都说“独眼望九州”，狡猾的分队长“独眼龙”也还蒙在鼓里！我们把一叠叠珍贵的情报资料送达地下党组织，胡习恒看着这些包括修理厂、汽车连、场兵连，乃至把机场所有的重要部门、人员情况都搜集到的情报资料，越看越高兴，笑眯眯地说：能从一堆枯燥无味的名字和数字中发现重要情报，真是火眼金睛！……

苦心巧用计

转眼过去了一月有余，我们发觉，机场内机群起落明显增多。很显然，这意味着国民党军队前线吃紧，柳州解放的日子很快就要来临了！我和罗鸿坤商量，如何抓紧时间，为柳州人民的解放多做些有益的事情。我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撤退一马，杀进一车”，打入文书室这个重要部门！罗鸿坤理解我的意图，即我俩同在军需室目标过大，惹人眼球，如果设法在文书室安装一个“猫眼”，一定能获取更多的重要机密情报。他向胡习恒作了汇报请示，很快得到了地下党组织的批准。不过，组织上考虑罗鸿坤在龙城中学那段时间的活动，有被人看“红”的迹象，为安全起见，让他主动撤离，留下我在机场坚持战斗。为了革命需要，罗鸿坤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上的决定。

9月初，一位年轻人来到机场文书室，用一口“土白话”向长官报告：“我是来自农村的穷学生，要为国效力，特来求职。”因为他讲的是“土白话”，像是怪声怪调的“外语”，逗得不少人哈哈大笑。长官是北方人，听得莫名其妙，幸好有一位广西籍的副官作了翻译，他才弄明白了。长官打量着这位土里土气的年轻人，问他有何特长？年轻人作了自我介绍：擅长誊写、起草文稿……还说：“长官要是不信，可以免费试用几日，不合你的心意，我立即滚蛋。”说着，撸衣舞袖，要当场露上一手。

当时战事危急，文书室也确实缺少人手，长官急着用人，恨不得“拉着黄牛当马骑”，何况这位年轻人有真本事呢！这位“白话佬”被免除了许多麻烦的手续，被长官录用了。

由于人员的变更，地下党对机场潜伏小组的联系迅速恢复。按原订的约会，我来到太平西街一巷 25-1 号的亲戚家，与胡习恒接上了头。他目光机警灵活，说话沉稳，虽然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却已是一名久经战斗考验的地下工作者。他这才告诉我，打入机场文书室的新战友，是我认识的龙城中学的图书管理员、地下党员梁仕臣同志。他还说，梁仕臣在你的领导下，共同战斗，组织上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最后，他约定了我们下次见面的时间、暗号，匆匆离去。

梁仕臣那套誊写和行文技能，在文书室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和发挥。他埋头整理杂乱的公文，实际上是在搜集可利用的资料。一次，长官让梁仕臣刻印一份飞机场汽油、炸弹、火箭弹、机枪子弹和飞机轮胎库存的统计表。为防止泄密，长官还派了两个卫兵在一旁警戒。梁仕臣心生一计，说是为了赶工，自己得抓紧时间刻钢板，让一个卫兵帮忙油印。这个卫兵没干过这种技术工作，一连印了好几张，不是墨油多了就是墨油少了，

印的字迹模糊，成了废品，扔进了废纸篓里。下班后，梁仕臣偷偷从废纸篓里挑出两张字迹较清楚的“废品”，藏在裤袋里，将其余的废品烧掉。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成功地获取了大批军事机密，如机场步兵设防的明碉暗堡、机场周边的地雷埋设区，以及武器弹药仓库，我们都了如指掌，这一切都变成了解放柳州，埋葬敌人的“炸药包”。

曙光照征程

俗话说：“兵败如山倒。”此话让我在机场得到了验证。国民党军政要员白崇禧、黄旭初坐镇桂林，扬言死守广西。可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像一艘破损不堪的大船，被人民解放战争的激流巨浪冲下了滩底，很快就要沉没了。我眼中的柳州飞机场，昔日的“军威”已一落千丈，杂言乱语随处可以听到，各部办公室内，公文摆置杂乱无章，查找一个文件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整个机场眼看要散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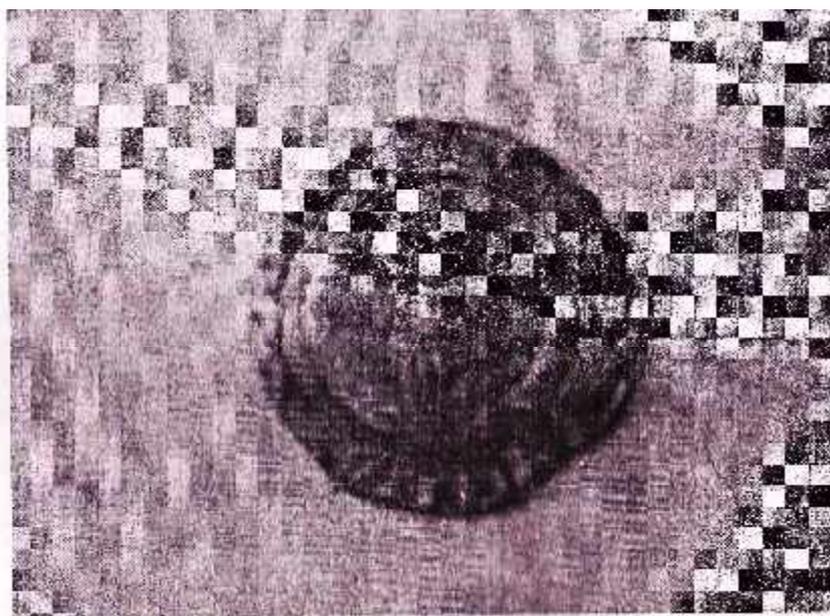
11月24日，是我在柳州飞机场潜伏了整整120天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这天，我从军需室的窗口望去，尽管天空云淡风轻，机场的气氛却十分紧张。机群起起落落，轰鸣声震耳欲聋。可是，不远的跑道上，一直停着两架运输机和一架战斗机，驾机人员从早到晚都在静守待命。我猜测，一定有军政大员要从这里起飞逃离……

下班时，我环绕机场附近的各部门走了一圈，经过分队长“独眼龙”的办公室，只见他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全然没有了往日的威风。我不便久留，匆匆离去。

我的猜测果然不错，早几天从桂林来到柳州的白崇禧，当晚10点多钟，伙同李品仙、黄旭初等一批国民党军政头目登机，连夜飞往南宁——原来，两个钟头前，我人民解放军已占领了沙塘！顿时，国民党军队闻风丧胆，机场内、市区内，乱成了一窝蜂。大批溃军蜂拥奔过浮桥，一辆辆军车穿城呼啸而去。

25日拂晓，解放军攻进了柳州城，根据事先掌握的情报，迅速占领了飞机场，控制了军用物资仓库。

柳州解放了！在欢庆的锣鼓声中，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五星红旗在城楼上高高飘扬。我丢掉了国民党空军的军服，重新穿上了学生装，迎着胜利的曙光，去柳州地下党联络处报到，由地下隐蔽的战线，走上了公开的公安战斗行列。



谢仲同志 1950 年荣获的解放华中南纪念章

暴乱与灭亡

——鹿寨全境剿匪斗争纪实

●吴 狄

第一节 策划暴乱

1950年1月，残存境内的国民党军被全部消灭。2月，白崇禧在台湾召见其国防部二厅上校情报参谋、军统特务何仲钊（雒容县石贵村人，化名向天雷），根据蒋介石逃台时制定的《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命令他潜回鹿寨，利用境内自然环境及地缘政治等条件，组织“桂中军政区”，在大瑶山与四十八弄广阔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发展反革命武装，播撒“复国”种子，以实现其“克服广西，反攻大陆”的梦想。

“桂中军政区”下辖第126和128两个军。向天雷的叔父何次山（曾任国民党军队少将副师长、柳州专区副专员及师管区司令），被任命为“桂中军政区”司令长官；向天雷为副司令长官兼第128军军长；在解放军两次围歼中逃脱的广西绥靖公署第3支队司令、惯匪林秀山，被任命为第126军军长。

1950年3月16日，向天雷经香港、广州、柳州潜回雒容县，立即与何次三密谋：第126军以金秀大瑶山为根据地，向蒙山、修仁、象州、武宣、桂平等周边各县游击、发展；第128军以四十八弄为依托，向中渡、雒容、榴江、柳城、融县（今融安、融水县）、百寿（今属永福县）、柳江等周边各县游击、发展，相机袭取桂中重镇柳州市；何次山则率“桂中军政区”长官司令部一伙人，随第128军行动。他们利用白崇禧败退广西时预伏的特务组织网络与原有社会关系，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各地，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深怀仇恨的地主、恶霸、反动军官、兵痞、流氓和惯匪很快纠合在一起；此外，还欺骗蛊惑一些不明事实真相的群众参加反革命武装组织。

1950年春末夏初，南、北朝鲜形势紧张，战争一触即发。解放广西并驻守广西的解放军第13兵团20多万兵力奉调东北边防，以应付突发事变。广西兵力锐减，防务空虚，匪特们于是乘时而起，4月中、下旬，几乎同时在鹿寨全境与桂中地区各县发动武装暴乱，袭击区、乡政府，抢夺仓库粮食，杀害政府工作人员和农会干部，伏击解放军和民兵零散武装，炸毁铁路和公路桥梁及袭击往来车辆，奸淫烧杀掳掠，无所不用其极。事后统计，当时境内在“桂中军政区”长官司令部统辖下，共有大小股匪77股，匪徒近9000人之多。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一幕幕生与死的斗争，随即在全境展开。

第二节 各地匪情

在中渡县

中渡县地处四十八弄边界，不少乡村在山弄之中，土匪最先在此发动暴乱。1950年4月4日，平山区板料村（已划柳城县）被匪第128军惯匪出身的支队长何荣所部300多名匪徒包围，该村18名民兵仅凭4支七九步枪及10多支单响和粉枪，坚决抗击匪徒多次冲击，毙敌14名、击伤15名后，当日下午3时许，解放军部队由柳城县太平镇赶来支援，方才解围。

4月10日~20日，惯匪林秀山第126军及军统特务向天雷第128军各一部，与匪中

渡县长、原国民党桂林绥靖公署第4支队上校司令覃丽天勾结，率1100余匪徒在中渡县城周围山区暴乱，杀害农民、商人数十人，抢劫耕牛300多头、生猪500多头，烧毁民房50余间，并扬言要攻打县城。

4月24日，匪第128军师长冯常钧在中渡县平山区龙婆村，残杀活埋我武工队员梁和、张书文等4人，武工队守卫的10多万斤军粮被抢劫一空。

6月19日，匪第128军6支队司令覃正晖，率1000多名匪徒包围中渡县安宁乡政府住地黄腊村，妄图抢夺存放于该村的百万多斤军粮，叫喊：“抓住和杀死正、副乡长，赏500元光洋！”“抓住和杀死一个武工队员，赏300光洋！”蛊惑匪徒多次冲击。武工队员和县大队一个班及民兵总共不到30人枪，坚守村庄，寸步不让，多次击退匪徒冲锋，直到第三天清晨驻中渡县城解放军第438团3营7连和武工队奔袭驰援，方解围。

7月25日，匪第128军团长张英甫（国民党中渡县自卫总队大队长），率匪徒200多人，围攻四十八弄中平山区莫道村张公桥屯存放10多万斤军粮的库房。驻守粮库的武工队员韦世林、张甫青、罗本建3人，仅凭步枪3支、驳壳枪1支、子弹100发、手榴弹10枚，固守待援，打退匪徒多次进攻。驻柳城县东泉镇解放军第468团1营闻讯赶来支援，里外夹击，毙匪12名、击伤35名后，始解围。解放军和武工队无一人伤亡，粮库亦无损。

8月初，中渡县鹰山区福龙村20多名民兵，畏于形势严重和敌特威胁利诱，哗变上山为匪。后经武工队追击，开展政治攻势，孤立分化瓦解，其中17人悔悟，携械投降。

重点剿匪开始前，如无10人以上的我军武装，县城5华里以外即很难通过。8月6日，驻长盛乡武工队员回县城送情报，在老虎弄被匪徒伏击阻击，未能通过，且伤了两人。实际上，县城是处在匪特的包围之中！

在榴江县

在榴江县，1950年5月4日，匪第126军团长韦永和、韦建嵩率400多名匪徒围攻务本乡政府。乡长陈嘉猷指挥武工队和民兵配合县大队一个排，坚守抗击，击退匪徒轮番冲击，激战两天两夜。解放军第438团2营两个连队赶来支援，夹击匪徒，毙、伤、俘敌30多名，匪徒溃退逃窜，始转危为安。

同年5月6日，匪第126军师长古肇镛和广西反共救国军第3兵团副司令官潘荣斋，率300余匪众，将榴江县大队一个连包围于头社村，激战竟日。后解放军第344团警卫连两个排赶来增援，毙敌5名，击溃了匪徒，始解围。第三天古肇镛又窜到龙江乡，把桂（林）柳（州）公路龙江至寨沙路段的电话线割断，并炸毁桥梁，抢去公路工程车1部及1千万元人民币（旧币），又枪杀工作人员1人和农会干部4人。此后，还在该公路上埋设地雷，妄图炸毁来往军车，卡断交通。

与此同时，匪第126军团长潘彩荣、廖立中等率400余匪徒，在榴江县黄冕乡境内暴乱，杀害慎言村农会主席梁昌远、副主席兼民兵队长巫剑彰及民兵21人（其中8人被剖腹挖心），抢去枪械50多支。

6月14日，解放军第436团两个连和县大队一个连共300多兵力，先敌一天，对盘踞北顶村，妄图攻打榴江县城寨沙镇的匪第126军团长刘才甫部400多名匪徒发起攻击，打破了匪徒的狂妄计划。刘匪凭借大地主恶霸何子章三个大院坚固的围墙，以及大院中居高临下的炮楼，垂死挣扎。解放军几次攻击均失利，战斗从当天拂晓持续到黄昏后。盘踞附近乡村的土匪竟敢分路赶来增援。于是，战斗形成了“顶牛”状态，虽然也毙、伤匪徒20人，解放军在伤亡20人后，只得撤出战斗。刘匪乘机率部逃窜到和尚岗山区。

一个月后，即7月16日~24日，刘才甫匪部又在安顺、峰村等乡村袭扰，杀害农会骨干11人，抓走27人，抢去枪械70余支。

7月28日，刘匪再次率匪徒400多人将板里村包围，全村15户人家73人惨遭集体杀害；对妇女则先奸后杀。劫难中，只有一名叫刘秋安的3岁小男孩幸免，在匪徒杀人抢劫离开后，才从遇难者的尸体中爬出，始得生还（此人尚在，现居寨沙镇）。全村财物，被洗劫一空。

当时，尚属修仁县管辖的四排乡（1951年6月划属鹿寨县），因背靠金秀大瑶山，又处于修仁、象州、榴江三县的接合部，桂（林）柳（州）公路纵贯全境，匪第126军三个头目闭尝轩、温鸣武（中统特务）、韩蒙轩，率2100多名匪徒于1950年5月~9月，在此踞扰，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多次封锁截断公路，威胁城乡交通，致使千家万户惊恐万状，心怀不宁。

在雒容县

在当时的雒容县，沿洛清江和柳江的几个区、乡如江口、运江（1953年划属象州县）和导江，匪第126和第128军一些头目卢启贤、卢石兵、钟华英、赖汉民、韦以斌、林其时、林其良、黄凤林、李志高、杨省堂、韦光太、韦善谋等，纠集匪徒，同时暴乱，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之外，还妄图封江断航，来往船只如无武装保卫，根本无法通过。匪徒们专对农会骨干与区、乡、村工作人员及解放军零散武装下毒手，大龙乡干部贾尚福、张秀英在鹿鸣村被杀；乡、村工作人员石广德、欧阳景明在屯连坳遭伏击身亡；雒容县干校负责人万家义及工作人员莫宗堤，下乡时遭暗杀；江口乡工作队员2人在长沙村被匪徒包围，他们抗击一昼夜之后，一人牺牲，一人被俘，匪徒将被俘干部挖眼、剖腹、掏心；县工作队7人在下湾村开展工作时遭袭击，全部壮烈捐躯；政府工作人员姚树义、郭尚焕、邱信才3人，全家均遭匪徒残杀遇难。

匪首卢启贤，1950年5月8日纠集100多名匪徒围攻江口乡人民政府，副乡长周豪指挥7名工作人员，与匪徒激战6个小时，驻对面河解放军第436团部队闻讯赶来支援方解围。6月30日凌晨2时许，雒容县武工队4人与县大队一个加强排共49人，从导江乡政府出发，护送患病的县大队戴副政委回县城治疗。拂晓前，队伍行进到四面环山的下湾村时，被匪林秀山第126军参谋长卢启贤及国民党江口乡乡长卢石兵等400多名匪徒伏击。武工队、县大队坚守阵地，顽强抵抗，两天两夜，寸步不让。第三天，县人民政府周春鸣县长与解放军第33大队两个连赶来支援，毙、伤匪徒10人后始解围。此次被伏，武工队、县大队亦伤亡数人。

从1950年4月底~6月初，雷安、都莲两村民兵，在运江乡民兵大队长蒋满春带领下，坚守村庄，4次击退匪徒围攻，保卫了一段江河航道。6月中旬，匪第128军黄凤林、林其昌、韦光太等头目，再次纠合200多名匪徒围攻都莲村，民兵奋起抗击，坚守三天三夜，终因敌众我寡，民兵被迫乘夜渡江突围，转移到对河象州县的双竹村。6月底，匪首杨省堂纠合150多名匪徒，围攻运江人民政府，副乡长曹含泽指挥7名工作人员固守待援，牺牲2人后，解放军第437团一个连由象州县城赶来猛攻匪徒阵地，敌人逃窜，乡政府工作人员始脱险。匪126军军长林秀山，还曾指挥匪徒一度袭占邻近象州县城，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不得不暂时撤出，转移到该县石龙镇和柳州市。

因为江口、运江、导江3个乡地处边远山区，又面临洛清江和柳江阻隔，匪患十分猖獗。1950年7月~8月，雒容县委及县政府曾令工作人员在解放军护送下，暂时撤回县城，只留下县大队、武工队和民兵少量武装，与匪徒周旋，尽力保护群众。

当时，雒容县匪患区域占全县总人口居住地的80%以上；榴江县92个行政村，被土匪控制的61个，受严重威胁的11个；中渡县50%的乡村，处于匪徒控制的四十八弄山区中，县城又地处于四十八弄边缘，县城5华里以外，即经常有土匪活动。一时血雨腥风，不少边远乡村，商旅因之绝踪，农民因之废耕，学子因之辍学，城乡交通中断，处

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一些地方，匪徒甚至公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狂叫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收复广西，反攻大陆，迎接白长官和蒋委员长凯旋”！

第三节 重点剿匪

面对土匪猖狂暴乱，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保卫人民生命安全，当时三个县的中共党组织与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请调解放军主力部队支援，还分别组建了县大队、区中队、武工队、公安队和民兵支队、大队、中队等地方武装力量。为了加强领导，中共广西省委批准成立中共柳北6县中心县委，以解放军第438团政委江洪洲为书记，在驻境内解放军第438团等部队的支持下，与匪徒展开了殊死斗争。特别是1950年10月，驻柳解放军部队休整结束后，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运动右倾偏向的指示》及军委主席毛泽东《关于1951年“五一”节前消灭广西股匪的指示》，划分区域，负责“包干”，解放军第428团负责柳州以北6个县，分别成立“社八地区剿匪工作委员会”（包括社八、平山、永安、镇江等地区）、“东泉地区剿匪工作委员会”（包括东泉、西岸、洛埠、大龙等地区）、“上雷地区如期工作委员会”（包括上雷、沙塘、城关、大浦及柳江以东部分地区），各县县委、县政府负责人分别任主任；解放军部队驻各县主力营首长参与组织领导，党、政、军、民、财五管齐下，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军事打击为主，辅以政治瓦解”等方针政策；中共柳州地委负责人陈东长驻鹿寨镇，指导协调全面工作，并被上级授予无需上报，可以批准处决匪首、特务的权力。重点追剿土匪斗争及社会情况，立即改观。

1950年7月2日，解放军第438团3营8连奔袭中渡县平山区古禄村，包围匪第128军101团团张英甫匪部，击毙匪徒40人，俘匪15人；缴获82迫击炮1门、轻机枪3挺、冲锋枪2支及战马2匹。此战，震慑了四十八弄山区中的土匪。

7月9日，匪第126军206团团潘金海、副团长陶五，指挥其团部匪徒60多人洗劫榴江县黄冕乡所有国营企业后，又窜到鹿寨镇四堡村，妄图袭扰由寨沙镇迁移不足一个月的榴江县城鹿寨镇。县委和驻军部队得到内线情报后，解放军第436团2营两个连在地方武装及民兵配合下，先敌一天，包围该敌。12日拂晓发起攻击，经4小时战斗，解放军以牺牲4人、负伤7人的代价，全歼敌人，计击毙匪团长潘金海以下44人，俘匪19人。仅匪副团长陶五带领5名匪徒，在战斗打响前到外村抢劫，得以逃脱；半年后，在四十八弄追剿中，仍为解放军活捉与击毙。

10月25日，解放军第438团1营两个连，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将匪第128军团长兼雒容县长韦以箴部280余人，包围在木汉、木平和长洞3个村庄，经两天一夜34个小时激战，以牺牲6人、负伤10人的代价，全歼该敌。计毙、伤匪营长韦东蕃以下68人，俘虏匪团长兼县长韦以箴、副团长韦昆以下156人；缴获重机枪1挺、长短枪114支、各种子弹4496发及战马2匹。

10月31日，解放军第438团1营，奔袭榴江县公相屯匪首毛文凤、关德超部，并合击匪第126军潘彩荣部，歼敌150多名，残匪逃窜躲藏。解放军就地驻剿，组织民兵，发动群众，清匪反霸，深挖细查，又毙、伤、俘匪70余名。

11月4日，驻平乐专区解放军第145师435团3营8、9两个连，和修仁县大队、县一、二区中队、民兵及武工队共590多兵力，分3路包围盘踞五福乡金贵、鹿舞两个村庄的匪第126军3师师长古肇镛、副师长闭尝轩部230余人，古匪乘隙逃脱；闭匪负隅顽抗，经一天激战，全歼该股土匪。计击毙46人，俘匪126军副参谋长温启钧、副师长闭尝轩以下184人，缴获长短枪50支，子弹12000多发，战马3匹。

11月中、下旬，解放军第438团2营一个连及地方武工队与民兵，在榴江县大路、杨柳等村庄周围地区捕捉散匪和潜匪，俘匪第126军207团连长韦齐、韦建民以下59人；争取匪第126军207团3营副营长黄英及政工室主任韦作祯以下62人投降自新。

在军事重点围剿和强大政治攻势瓦解的双重打击下，窜扰、盘踞铁道及公路两侧乡村的股匪大部被歼，漏网的匪徒纷纷逃窜到大小瑶山及四十八弄山区躲藏。

第四节 解放军第21兵团入境剿匪

为进一步贯彻执行军委主席毛泽东《关于1951年“五一”节前消灭广西股匪的指示》，解放军第21兵团（司令员陈明仁、政委唐天际）两个军，奉命由湖南省入桂剿匪。1950年12月11日~18日，第52军215师（师长张镜白，政委江腾蛟）643、644和645三个团万余兵力，进抵黄冕、鹿寨、雒容铁道沿线，师部驻节雒容县城。在广西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统一指挥下，加强了对鹿寨全境及桂中地区各县的重点剿匪工作。

雒容、榴江两县剿匪

1951年1月5日，解放军第643、644、645三个步兵团，在当时境内三个县县大队、区中队、乡干、武工队560余人及民兵171人配合下，开始对雒容、榴江、象州3个县以北，修仁县以西及雒容、榴江县至象州县，执行封江和封路，并设卡切断该地区土匪与四十八弄其指挥机关的联系，防止匪徒外逃。1月8日，643团开始合击雒容、榴江两县以南、象州县以东地区之匪；644和645团及驻平乐专区第145师一个营，则进剿龟缩于小瑶山、大瑶山地区之敌。大军压境，匪徒恐慌，四处流窜躲藏，妄想突围，东山再起。

解放军立即调整布署，反复搜剿，昼夜穷追，将匪徒指挥系统打乱摧毁，迫使其不得喘息，疲于奔命，孤立分散无援，彻底丧失战斗力。然后，以连、排为单位，在地方武装及民兵配合下，实行驻剿、搜剿和追剿，并发动群众清查散匪，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做到标语上山，传单入峒，人人开口，个个宣传，户户访问，村村开会，大张旗鼓地宣传执行并兑现“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给胁从的匪众指明生路，迫使匪首陷于孤立无援之绝境。1月12日，解放军第643团1营在冷水屯和群众共同搜山时，击毙匪第126军独立4团团团长韦永和及副团长潘永堂以下42人；2月12日，解放军第644团1营2连班长杨文忠带领全班战士，在龙屯、潘村菲争取第126军支队司令潘再中、匪团长潘毓珩28人投降自新，并俘匪第5纵队司令陆腾云，缴获手枪2支。“杀人魔王”刘才甫匪部在河上江等山区被聚歼时，刘匪只带1名卫士逃脱，解放军第645团王永钦“追剿飞行组”追捕30多次均扑空，但他们仍不灰心，忍饥挨饿，踏雪卧冰，翻山越岭，昼夜穷追。2月14日，在第34次行动时，终于在北顶山上将匪首刘才甫捉拿归案。榴江县务本乡223名民兵，配合解放军搜山捕捉散匪7次，单独执行搜山任务22次，俘匪营长以下20人，缴获长短枪44支，子弹630发。

经过50多天围剿、追剿和驻剿，平乐、荔浦、修仁、象州和永福等周边各县的战果不计，仅境内雒容、榴江两个县即歼灭土匪2684名，其中排以上匪首111名。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巨大的天罗地网中，大匪首林秀山、邓海山、卢启贤、古肇镛、刘才甫等，均被一一活捉。

第五节 四十八弄剿匪

匪“桂中军政区”林秀山所部第126军在大小瑶山彻底覆灭之后，解放军第215师剿匪部队略事休整，即以634、644两个团4000多兵力横渡洛清江，在解放军第146师438团及驻永福县解放军第147师440团配合下，矛头直指四十八弄山区中的匪“桂中

军政区”长官司令部及其第 128 军。围剿四十八弄土匪的前线总指挥，是解放军第 21 兵团 52 军副军长吴焕林；215 师由副师长于振河负责具体指挥作战，指挥部设于雒容县城。643 团驻中渡县城，负责弄区东北部进剿；644 团驻平山镇，负责弄区西南部进剿。前线指挥部的具体布署是：（一）解放军第 438 团在地方武装及民兵配合下，进剿融县和柳城两县与四十八弄接合部之匪，形成第一道封锁线。（二）解放军第 644 和 643 两个团与 440 团 3 营，配属县大队 642 人（中渡县 243 人，榴江县 268 人）、乡干、武工队 802 人（中渡县 184 人，雒容县 309 人，榴江县 268 人）、民夫担架队员 1200 人（由中渡县组织）、随军工作队 9 个 250 人（解放军指战员 200 人，中渡县干部 50 人），作为主攻部队，负责进击、歼灭四十八弄山区腹地中之匪徒主力“桂中军政区”长官司令部及其第 128 军。为便于行动迅速，准确无误，中渡县政府还选派出 50 名带路向导兼翻译。（三）解放军第 215 师司令派出 6 个炮兵连和两个步兵连，配属中渡、雒容、榴江 3 个县 500 多民兵，从理定到洛埠，由黄腊至大坡，沿洛江和洛清江两岸，封江封路并设卡，形成第二道封锁线，将方圆纵横 200 多华里，位于百寿（已合并永福县）、中渡、融县（今融安县的二分之一）及柳城 4 个县边界的四十八弄山区，合围隔离起来。

3 月 20 日，分东南与西北两重点，解放军第 644 团为主攻，643 团为助攻，全线总攻，兵分 17 路，从 17 个不同方向，采取多路多点突进，纵深配置拉网的合击战术，围歼四十八弄山区中的匪指挥部及其主力。

作为“尖刀”的解放军第 644 团 2 营 6 连在营长武福有带领下，直捣西南面中渡县平山区屯秋村匪“桂中军政区”长官部及其第 128 军司令部。当解放军部队凌晨运动到寨脚村时，被匪哨兵发现并鸣枪示警，解放军战士迅即将其击毙。匪警卫大队长洪英武闻警率百余名匪徒赶来阻击，掩护其指挥部撤离。武福有营长立即命令连指导员高超，指挥“尖刀”3 排消灭当面之敌；亲率 1、2 排绕道直扑屯秋村敌司令部。冲入敌司令部时，发现匪主要人物已逃跑，只缴获官防印信和抓了一些零散匪徒。武营长率部返回寨脚屯时，3 排已将洪英武及其他匪徒全歼。全连会合后即抢占制高点，此时，2 营教导员黄大贵也带领机炮连赶来会合。武福有营长命 4 连直插同钱弄；6 连与机炮连抢占制高点，就地搜山追击，并命全营轻重武器齐射 20 发，以震慑敌人。当天，共俘匪徒 400 余人。4 连在向同钱弄攻击前进时，击毙“桂中军政区”6 支队参谋长陶业信以下 6 人，俘匪 10 人，但不见匪首何次山与向天雷。在四十八弄东北面，解放军第 643 团副团长闫侯洪指挥 1 营 2 连及营部侦察班，猛攻中渡县北端安宁乡山尖村的古里朝屯，毙匪 20 余人，俘匪 130 余人。

在大小瑶山重点剿匪中，漏网逃到四十八弄的匪“广西反共救国军”第 3 兵团副司令潘荣斋被俘后交待，解放军即将围剿四十八弄，匪“桂中军政区”长官部及其第 128 军的大小头目，在屯秋村开了一天会。面对大小瑶山匪徒已经覆灭，解放军即将围攻四十八弄的局势，匪徒们讨论了潘荣斋的三条意见：第一，把队伍拉到贵州、云南两省边界，与那里的反共势力会合，等待时机，但一算，路太远，关卡重重，时间不允许；第二、利用四十八弄的复杂地形，分散隐蔽，与解放军周旋，就地打游击，但又怕游击战争不是解放军的对手；第三，分散突围，然后到象州县桐木、石龙及柳江等地分散隐蔽。匪徒们权衡再三，最后采纳了第三条意见。但他们还来不及执行会议决定，经解放军多路进军的一天攻击，其指挥系统、组织建制和突围计划已被全部打乱摧毁，匪首匪众如丧家之犬，纷纷四散逃匿。

为此，解放军围剿部队立即按原划分的责任区域，严密封锁一切道路，并拉网搜山，村村驻军，山山设哨，路路布卡，白天搜剿，晚间埋伏，断绝粮道，把守水源。9 个随军工作队和民兵则深入发动群众，揭露土匪罪行，宣传剿匪政策，粉碎敌人“匪民一家”

的阴谋，把强大的政治攻势与凌厉的军事打击密切结合起来，断绝了匪徒的一切生存条件。顿时，整个四十八弄山区出现了老少同抓土匪，父母妻儿（女）动员匪亲属投降自新的局面。

1951年3月22日，解放军第644团2营4连，在中渡县大兆村潮水附近的石洞中歼匪4名，在晶丹附近俘匪5名；24日，644团2营炊事班长孔云祥和通讯员，在中渡县平山区屯秋村土城屯一处石洞中，活捉了匪第3兵团副司令潘荣斋；匪第21师副师长潘荣彩，出洞下山偷食也被群众抓获；643团2营4连，在中渡县高坡村搜山追击土匪时，一股匪徒龟缩在悬崖山腰的石洞中使用机枪顽抗，阻击解放军接近洞口，4连爆破手夏保仁从侧翼攀登到悬崖顶端，将炸药包和手榴弹用绳索拴住后吊入洞中引爆，炸死10余名匪徒；解放军第643团1营2连，在古里屯激战后追击一股匪徒，副炮手李门看见3名匪徒逃到百多米高的山坡上，他迅即登上山峰，击毙两名匪徒，又与另1名肉搏格斗，将匪徒推下悬崖摔死；解放军第643团2营6连战士丁喜保，在追击逃敌时从3丈高的悬崖上跳下，左臂骨折3处，仍忍痛活捉1名逃敌。

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匪徒们陷于了绝境。匪“桂中军政区”中将高参覃明河、第128军副军长陈佐雄及政工主任兼组训科长郝更生、第126军参谋长周绍芳、第6支队司令覃正晖等一批重要头目纷纷落入法网，但匪首何次三与向天雷仍未见踪迹。解放军各部队于是又挑选战斗骨干，组成3~5人不等的飞行组，或索性化装成“土匪”，昼夜不停地搜剿、追击。解放军第644团3营8连连长王光汉亲率“飞行组”，经7昼夜跟踪追击，4月1日上午，在土城木咀山上，将匪“桂中军政区”司令长官何次山与他的1名卫士击毙，并活捉了另一名卫士，缴获冲锋枪2支、手枪1支；4月2日下午，解放军第644团2营6连1排化装为“土匪”的“飞行组”，在距屯秋村3华里的小平山屯搜山时，抓住一个叫于四的土匪，经审讯发现匪“桂中军政区”副司令长官兼128军军长、军统特务向天雷的行踪，排长徐海江立即带领刘仕和等7名战士穷追不舍，终于在一地洞中将向天雷及其副官余龙活捉，并击毙其卫士李维；643团2营6连王永钦“飞行组”，在中渡县高坡村下翁屯三叉路口设伏，活捉了匪第312师副师长兼融安县长廖世祥；匪第312师师长冯常钧、副师长曾远仁、匪中（渡）百（寿）榴（江）3县联防司令部参谋长莫秀华、匪7支队副司令覃继太等一批重要头目，也一一落入解放军追剿“飞行组”手中。

至1951年4月15日止，四十八弄重点剿匪任务基本完成，流窜于山区中的股匪全部被歼灭。据当时《桂北日报》报道，1951年4月17日从解放军第215师司令部作战科获悉，共歼灭土匪5464名（毙、伤、俘及投降自新合计）。其中，中渡县境内（即今中渡、平山两镇）歼灭土匪2580多人，师以上匪首9人，团级匪首38人，营级匪首55人，连级匪首108人，排级匪首103人。缴获长短枪1600多支，轻重机枪30多挺，子弹35469发，其它物资一批。另加上雒容、榴江两县及四排乡重点剿匪中的缴获，总计为各种长短枪6638支，子弹303404发，各种炮6门，炮弹454发，轻重机枪54挺，枪榴弹344枚，手榴弹5120个，炸药1716斤，地雷74个，电话总机4部，电话单机53部，马27匹。此外，还收缴民间的长短枪1038支，土枪33支，鸟枪1667支，手榴弹316个。

第六节 清匪反霸，根绝隐患

为了根绝隐患，巩固新生政权，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展工农业生产，彻底医治战争创伤，重点剿匪期间和剿匪胜利结束之后，境内3个县均成立了“清匪联防指挥部”，区、乡、镇建立“防匪自卫委员会”，村、街建立“剿匪搜山小组”，深入开展清

匪反霸，深挖暗藏敌特分子，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鹿寨境内共抓捕及投降自新的土匪、匪霸 2242 人。事后，关押劳动改造 1367 人，交群众管制 165 人，释放 486 人，依法处决匪首、匪霸 224 人（其中中统、军统特务兼匪首 17 人）。加上 1949 年 11 月 29 日解放军进入县境后，历次战斗共歼敌 10500 多名，其中团以上匪首 157 名。

重点剿匪胜利结束后，雒容县、中渡县和榴江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法庭，分别在 3 个县的雒容镇、中渡镇、鹿寨镇和寨沙镇，依法公审处决匪霸卢启贤、杨省堂、覃明河、覃正晖、古肇镛、刘才甫等人（军统特务向天雷，于 1953 年 4 月在雒容镇处决）。十里城乡，万人空巷，人民群众以一睹恶魔下场为快！当时，群众曾书写一副对联，虽欠工稳，却颇能反映社会民心：

**想当年，国民党在此，匪霸当权，烧杀掳掠，血海深仇无处诉；
到如今，共产党领导，政府撑腰，穷人翻身，追怀故旧悼亡魂。**

后记：为了真实地、准确地记录差不多 60 年前党和政府领导全县人民保卫新生政权，解放军指战员英勇作战，彻底消灭县境内反革命武装的英雄事迹，笔者除经历中渡县剿匪全过程所见所闻之外，还查阅了以下资料：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45 师 435 团、146 师 436 团及 438 团 1950—1951 年 4 月在境内剿匪的战报；②当时设在桂林市的区党委机关报《桂北日报》的战地新闻报导及通讯、特写；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15 师政治部 1951 年 7 月编印的《剿匪胜利纪念册》，撰写此文，并搜集整理了一份《1950 年～1951 年鹿寨境内“桂中军政区”被击毙、打伤、活捉及投降的团以上匪首名单》，附之于文后，以供读者诸君参阅。

2008 年晚秋，于县委大院内之“耕读书屋”

1950～1951 年鹿寨境内“桂中军政区” 被击毙、打伤、活捉及投降的部份匪首名单

姓名	匪 职	时 间	地 点
何次三	“桂中军政区”司令长官	51. 4. 1	屯秋土城
向天雷	副司令长官兼一二八军军长（真名何钟钊）	51. 4. 2	小平山
何冠民	“桂中军政区”参谋长	51. 4. 3	拉峒
覃明河	“桂中军政区”中将高参	51. 3. 28	山尖村龙山
林秀山	一二六军军长	51. 2. 25	象州县大乐
邓海山	一二六军副军长	51. 1. 30	寨沙镇
覃劲松	一二六军政治部主任	51. 2. 16	龙村
陆云屯	反共救国军广西联军五纵队司令	51. 3. 20	文黄
潘荣斋	三兵团副司令	51. 3. 20	屯秋
陈佐雄	一二八副军长	51. 3. 29	同前弄
郝更生	一二八副政工处长	51. 3. 27	屯秋
廖加辛	一二六军副团长	50. 12. 27	东有村
廖永清	二〇七团参谋长	50. 12. 27	冷水
韦增堂	团参谋长	51. 1. 5	欧阳村
黄奉坤	一二六军情报队长	51. 1. 18	大步

梁光周	三〇三团副团长	513. 1. 12	崇常
韦永和	桂独四团团长	51. 1. 12	冷水
林忠麟	第三师军需主任	51. 1. 12	榴江
李绍付	副团长	51. 1. 13	和敬
韦建松	桂独四团副团长	51. 1. 13	冷水
梁永堂	桂独四团副团长	51. 1. 13	冷水
邓桃芳	二〇一团副团长	51. 1. 15	榴江
李家南	一二六军团长	51. 1. 15	何甫
许春秋	一二六军参谋长	51. 1. 16	岩背
闭振勋	一二六军团长	51. 1. 16	金贵屯
林志成	桂中四支队秘书长	51. 1. 16	榴江
李连开	桂中四支队副团长	51. 1. 16	河上江
何 凯	桂中四支队政工主任	51. 1. 18	榴江
陈自强	一二六军副团长	51. 1. 18	运江
李振藩	三〇三团参谋长	51. 1. 18	和敬
李国椿	三〇三团副团长	51. 1. 18	和敬
何 茂	一二六军特务队长	51. 1. 18	龙团
刘德金	一二八军副团长	51. 1. 18	雒容

姓 名	匪 职	时 间	地 点
黄贵荣	象县独立团长	51. 1. 19	古平
韦光贵	一二八军团长	51. 1. 19	都连
何宽生	桂中四支队副室主任	51. 1. 19	榴江
戴希南	榴江县长	51. 1. 19	榴江
李继民	桂中四支队团长	51. 1. 20	榴江
石玉辉	桂中四支队副团长	51. 1. 20	榴江
邓福顺	桂中四支队团附	51. 1. 20	榴江
邓景勋	桂中四支队参谋主任	51. 1. 20	榴江
刘玉廷	三〇三团团长	51. 1. 21	建南
陆 凯	象县独立团副团长	51. 1. 21	大岩
邓发章	二〇八团参谋长	51. 1. 21	榴江
李尚光	二〇八团政工室主任	51. 1. 21	榴江
谢德斌	二〇一团副团长	51. 1. 22	志阳
戴求明	三〇九团参谋长	51. 1. 23	榴江
黄家和	桂中四支队副参谋长	51. 1. 24	榴江
王 珏	二〇一团政工室主任	51. 1. 24	榴江
戴年德	桂中四支队参谋长	51. 1. 24	榴江
陈明礼	桂中四支队军需主任	51. 1. 25	榴江
邱亚辉	一二六军三师秘书长	51. 1. 25	龙江
古肇镛	一二六军三师少将师长	51. 1. 25	拉寨
王聘珍	一二六军七师副团长	51. 1. 25	大步
唐永安	一二六军三师参谋主任兼团长	51. 1. 25	浦上

蔡中金	一二六军团长	51. 1. 26	金龙
唐肇中	一二六军三师副团长	51. 1. 27	榴江
林烽冠	桂中四支队副司令	51. 1. 27	榴江
刘国方	一二六军三师参谋长	51. 1. 27	拉寨
李海英	一二六军三师团长	51. 1. 27	榴江
徐丙祥	桂中四支队司令	51. 1. 28	榴江
龙云凯	雒柳象三县联防指挥所主任	51. 1. 28	群玉山
戴去基	桂中四支队军需主任	51. 1. 28	榴江
陆金秀	一二六军三〇九副团长	51. 1. 28	榴江
刘绍达	一二六军三〇八副团长	51. 1. 28	榴江
韦士刚	一二六军四三团突击总队长	51. 1. 29	鹿平
杨西济	反共救国军团长	51. 1. 29	丹竹
黄武荣	桂中游击总队副司令	51. 1. 29	榴江
钟荣禧	三〇九团团长	51. 1. 30	务本
古英贤	三〇五团团长	51. 1. 30	拉寨

姓 名	匪 职	时 间	地 点
廖靖昆	三〇九团副团长	51. 1. 30	榴江
谭甫才	三十六军团长	51. 1. 30	岩湾
邓文甫	二〇一团团长	51. 1. 31	榴江
温家成	一二六军副团长	51. 1. 28	裕群
潘 镇	九师政治部主任	51. 2. 1	白山
梁延龄	九师中校校长	51. 2. 1	长洛
黄秀彬	九师中校秘书	51. 2. 1	白山
童世盛	九师中校医官	51. 2. 1	古平
刘玉安	二〇八团参谋长	51. 2. 2	寨傲
彭 斌	三师参谋长兼团长	51. 2. 2	拉寨
陆云中	越南反共救国军广西联军独立团长	51. 2. 2	龙庆
邓光平	三师参谋主任	51. 2. 3	龙江
谭伟才	三〇二团团长	51. 2. 4	杜康
江 山	一二六军团长	51. 2. 4	导江
周瑞珍	一二六军团长	51. 2. 4	江口
陈业士	桂中游击总队团长	51. 2. 5	榴江
唐业双	二〇八团副团长	51. 2. 7	杜康
韦 耀	二〇九团团长	51. 2. 3	榴江
温孔修	二〇九团副团长	51. 2. 6	和木
楼业芳	九师副团长	51. 2. 9	长路
李济高	一二六军副师长兼团长	51. 2. 10	古拉
林老三	一三三师参谋主任	51. 2. 10	惠华
付 新	三师政工室主任	51. 2. 10	惠华
潘在中	突击支队副司令	51. 2. 12	龙山
刘才甫	二〇八团团长	51. 2. 14	北顶

罗玉龙	一二六军团长	51. 2. 17	洛埠
钟华周	一二六军团长	51. 2. 17	洛埠
田方荣	一二六军独立三团团长	51. 2. 17	岭塘
徐飞雄	第九师团长	51. 2. 19	塘口
周瑞敦	三十三师参谋长	51. 2. 20	江口
潘毓秀	一二六军团长	51. 2. 19	潘村
黄 雄	一二六军副团长	51. 2. 21	京林
梁瑞芝	三〇二团参谋长	51. 2. 22	木料
卢石滨	一二八警卫团长	51. 2. 24	甲图
曾宇昭	一二八军团长	51. 2. 24	六廷
刘馨福	一二八军团长	51. 2. 20	雒容
刘树平	一二八军才长	51. 2. 20	雒容

姓 名	匪 职	时 间	地 点
韦 继	一二八军二师团长	51. 3. 20	同前弄
罗庆安	一二八军五支队副司令	51. 3. 20	古里槽
陶业信	一二八军六支队参谋长	51. 3. 20	古里槽
张开祥	一二八军六支队军需主任	51. 3. 20	古里槽
刘本汉	“桂中军政区”长官司令部秘书	51. 3. 22	莲花
韦星行	第六军卫生处长	51. 3. 24	龙门
肖亮坤	独立五支队副司令	51. 3. 24	高坡
韦允忠	第六军军需主任	51. 3. 24	怀态
覃九如	七支队副官主任	51. 3. 24	古板
周耀芳	第六军参谋长	51. 3. 24	五指山
廖湖珊	三十一师师长	51. 3. 25	莲花
黄十七	三十一师团长	51. 3. 27	黄道山
覃正晖	一二八军六支队司令	51. 3. 28	龙山
覃国太	一〇一团政工室主任	51. 3. 28	中村
潘 驹	一〇一团副团长	51. 3. 29	龙登
莫梦刚	五支队秘书长	51. 3. 29	下翁
覃继太	七支队副司令	51. 3. 29	左板
何思知	五支队参谋长	51. 3. 29	板峒
曾远仁	三一二师副师长	51. 3. 29	板陇
谢祖廷	第八军副团长	51. 3. 29	黄道山
蒋中兴	独立支队政工室主任	51. 3. 30	龙登
黄井书	中百榴三县联防部军法主任	51. 3. 30	潮水
汤常钧	三一二师师长	51. 3. 31	高坡
周金明	七支队团长	51. 3. 31	斗要
曾力革	三一二师参谋主任	51. 4. 1	怀态
何思范	支队长	51. 4. 4	黄村
潘彩荣	二十一师师长	51. 4. 6	百花寨
何志光	七支队副官主任	51. 4. 6	板峒

莫秀华	中百榴三县联防部参谋长	51. 4. 16	禾道
罗义勇	七支队副司令	51. 4. 7	上洪
何保德	支队长	51. 4. 7	黄村
周老黑	支队长	51. 4. 7	黄村
廖光耀	三一二师团长	51. 4. 11	古雨
李秀川	二三〇副团长	51. 4. 15	风木坪
何 荣	七支队司令	51. 4. 16	榨油
韦中枚	八十一团团长	51. 4. 21	百花寨
韦继明	独一师突击团团长	51. 4. 21	麦峒山

袭击日军军车

●林老义 廖鸿仁 廖国佑 / 口述
林怪华 / 记录整理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已到了强弩之末。为了保证军用物资的补给，也为了准备战略退却，日寇疯狂地发动了打通经广西到印支半岛陆路交通的攻势。他们以占领的桂（林）柳（州）公路和湘桂铁路沿线的城镇为据点，保护其交通运输线的畅通。有血性的中国人纷纷起来抵抗打击侵略者，以榴江县镇江乡（今鹿寨镇波井村）小学校长周民哲（系国军退役团长）为首，组织各乡村民团自卫队，加上榴江县县警，在东马村附近的公路上，打了个伏击战，消灭了一伙日军，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一时间，民心大振，不少民众也自行组织起来，袭击小股的日本兵，偷割军用电线。

那时，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的鹿寨镇，也有日军驻守。龙井乡公所的大小龙田和寨头村的刘守之、刘守凤等七八个人，商量要去打日本鬼子的军车，夺鬼子的军需物资。他们又联络了王启文、王启德、林品忠、林品贵、李木保，还有大井村的两三个人，一共有20多人，商定了日子，准备行动。

那是农历十月的一天，天气已经有点寒冷了。这20多人各自带着武器，大清早就来到陶家坪王启章家里会合。他们有12支钢枪，都是些“盖板六五”、“七九”和“汉阳造”，每支枪有10多发子弹；还有3支火药鸟枪和1支也是打火药的台枪；另外，有4个手榴弹和2把马刀。大约8、9点钟，他们从陶家坪出发，走黄泥塘（今拘留所一带），来到了五里亭附近的小山上（今五里亭加油站附近）。除了派人往鹿寨方向担任警戒，还派人到十里亭打探榴江方向有什么情况，其余的都忙着搬石头在公路上设置障碍，随后往鸟枪、台枪里装填火药、铁砂，台枪里的铁砂比黄豆粒还大，还装有碎锅钢片。一切准备停当，大家便埋伏起来。

去十里亭方向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那边没有异常情况，也没看到鬼子的车辆。大家耐着性子等待，拿出带来的红薯、芋头，填饱肚子。大约又过了半个多钟头，从十里亭方向传来了“呜呜”的汽车声，大家赶紧把子弹压进枪膛，把手榴弹的保险盖拧开，准备战斗。很快，东头的公路上，出现了一辆蒙着米黄色帆布的卡车，正向鹿寨方向开来，渐渐地能看清了插在车头的一面不大的太阳旗——是鬼子的军车！王启章对大伙说：

“听到我的命令才一齐开枪。”

卡车开到公路上的障碍物前，被迫停了下来。从车上跳下来4个鬼子兵，一边“叽咕噜”地骂着，一边搬开石头。王启章一声令下：“打！”顿时，排枪齐响，台枪轰鸣，几个鬼子不知是中弹倒下了，还是趴下来藏身了。随即，从车上又跳下30多个鬼子兵，朝王启章他们还击——看来，这是一辆鬼子的运兵车。王启章指挥大家，又向鬼子打了两轮排枪，扔出了3颗手榴弹。一时间，公路上硝烟弥漫。鬼子的火力太强了，除了“三八枪”、机关枪，还用上了小钢炮，打得他们抬不起头。鬼子见压住了对方的火力，开始往小山上冲来。王启章见势不妙，招呼大家边打边撤。大概鬼子不明底细，也不敢贸然急追，只是跑跑停停地开枪。

王启章他们怕鬼子追到村里进行报复，不敢直接跑回村去，而是往大石山（今射击场）那边跑去。跑到八块田时，突然听到和尚岭（今殡仪馆）闷水塘那边也传来了一阵枪声，大家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以为鬼子还是追来了！大家赶紧经狮子岭脚、雷公座岭脚，过蹦歪，又经癞子岭脚，往寨头隘口方向一直猛跑。直到进了隘口，不见鬼子追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放慢脚步回寨头村去。

事后得知，和尚岭闷水塘之所以响枪，是因为村里有3个青年仔听说王启章他们要去打日本鬼子，也想去参加。可是这三个人不晓得王启章他们在哪里设伏，走错了方向，从大凹槽走到了闷水坑。刚走上闷水坑的山坡上，就远远地看见了一帮日本鬼子。三个青年仔不管三七二十一，趴在坡上就朝日本鬼子开枪。这一来，倒是给王启章他们救了急——本来，鬼子兵是想从和尚岭闷水坑这里出小龙田，从侧面去抄后路的，见有人开枪抵抗，以为对方早有准备，怕中埋伏，这才放弃了追赶。

这一仗，从战斗打响到撤退，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也没有缴获什么东西。但他们亲眼看见放倒了几个鬼子兵，尽管不晓得这几个鬼子到底死伤如何，可总算是出了口恨气，让小鬼子晓得我们鹿寨的老百姓也不是任由他们横行霸道的！

中渡剿匪岁月漫忆

●谢永宁

1949年上半年，我在武宣惠儒中学读书，覃秉寿老师常暗地里给我们几个壮族学生讲革命道理，讲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后来才知道，他是1947年广西地下党中秋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这一年7月，我们毕业了，我父亲卖牛买了一支驳壳枪，让我参加我小学时的教导主任蒙光朝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桂中支队来宾大队。也是后来才知道，我父亲也是桂中游击队来宾大队的成员。

初到中渡

1949年11月29日，来宾县解放了。我和一部分战友调编到柳州地委剿匪工作队，先后跟随莫矜副专员和地委陈东秘书长到柳城、柳江开展剿匪工作。1950年3月，我和其中的5位战友奉命到中渡县参加剿匪。我们背着简单的行李，肩扛七九步枪，脚踏自编的草鞋，赶到中渡。我被分在中渡一区，区长是何韬，副区长是蔡菩菴。他们安排我担任区公所的文教助理。

初到中渡，只要不是圩日，我们三、五个人做一组，到周围村庄宣传剿匪政策，稳定人心。逢圩日，我负责出一期黑板报。有一天，我正在区公所门前写黑板报，有不少

人在围观。写到歼匪捷报时，背后有人用壮话说：“越看越X火起！”我回头一看，说这话的是一个农民模样的汉子。我鼓起眼睛盯着他，他才知道我原来懂得讲壮话，惊慌地溜走了。这人，竟然是混在群众中的土匪！后来，在剿匪战斗中，他被活捉了，召开公审大会后被枪毙了。

那时，剿匪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土匪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很危险的，也许我们的脑袋什么时候搬家都难讲。但我们这帮 20 来岁的热血青年，一心跟党走革命，勇于在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中接受考验，虽然在“土匪窝”的地方工作，也不怕危险，而感到无上光荣。

活捉土匪参谋长潘永汉

1950 年深秋的一天，天气阴晴，寒意袭人。下午 6 点钟左右，有一位农民来区公所报告：在城关区大村前面的山上发现匪情！区公所的领导高中（南下工作团的同志）立即组织我们区干和公安局两位同志，一共 8 人，带上武器，由那个农民领路，迎着寒风，踏上崎岖的山道，越过长盛坳，奔向大村。在一处冲槽，我们看到冲槽顶一座山上的岩洞口正冒出缕缕青烟。我们即分兵三路包抄合围，堵住土匪逃跑的去路。当我们冲上去时，那土匪还在火堆旁煨着从群众地里偷挖来的红薯呢！饿得青皮寡瘦的他，哪料到我们会这么神速地赶来抓他！

随着几声大喊：“不许动！缴枪不杀！”那土匪窜出洞口，翻滚下沟，要负隅顽抗，我们的枪弹已无情地击中他的大腿。他“哎哟”一声，在草丛中举起双手，连连求饶：“我投降，我投降，不要杀我……”我们缴下他的一支驳壳枪和 10 多发子弹，当场审问，得知他是土匪某部的参谋长，叫潘永汉，和他在一起的几个土匪已经走散了……我们朝洞里一番射击之后，进洞搜索，果然已不见匪踪。

我们押着撑着木棍一拐一拐行走的土匪参谋长，直到第二天东方发白的时候，才回到中渡。不久，召开了公审大会，这土匪参谋长韦永汉被枪毙了。

叛变投敌的下场

1949 年冬，随着解放，开始组建地方人民政府。当时，需要大批的干部，很多青年纷纷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革命的滚滚洪流中，不免夹杂着泥沙和垃圾。中渡县大兆村的青年韦鸿群，就是在这个时候投机革命，当上了中渡区公所干部的。

那时，新生的人民政权尚未巩固，上千国民党残兵败将和土匪集结在四十八弄，继续负隅顽抗。他们造谣惑众，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就要打回来了”。韦鸿群动摇了，背叛了革命，回去当了土匪，还当了个小头目，烧杀抢劫，与人民为敌。

刚开始剿匪时，我们抓到土匪，仅给予教育一下，不论罪恶大小，就释放了。好些人回去后仍不悔改，继续为匪。群众意见很大，称之“宽大无边”。后来，纠正了这种“宽大无边”的做法，严惩罪大恶极的匪首，开了杀戒。韦鸿群就是在这个时期，在剿匪战斗中被俘。

这个投机革命，动摇变节，与人民为敌的叛徒韦鸿群，终于没有好下场——在中渡广场召开公审大会后，被执行枪决了！

鹿寨县十大水利工程

● 沈光明

石榴河引水工程

民国时期，榴江县政府曾费时 6 年，耗资约合大米 24.8 万担，仍未能完成石榴河水利工程的修建。解放后，国家于 1952 年投资 50 万元，在原坝的基础上续修这项工程。1953 年 3 月，坝首、渠道同时完工。但由于国民党时期所砌的坝基不牢，同年 5 月坝首被洪水冲垮。1957 年，县委决定重修。由桂林专署水利科勘测、设计，将坝首移至镰刀湾村背谷口段（距原坝址 1 公里）。设计为重心污工坝，设计流量为 4 立方米 / 秒，灌溉农田面积 4.5 万亩。1957 年 10 月 8 日成立“鹿寨县石榴河工程委员会”，负责指导施工事宜，同年 10 月 18 日动工。1958 年 3 月 5 日竣工，3 月 20 日引水灌田。实灌农田面积 3.4 万亩。

二排河引水工程

1955 年，由广西省水利厅第三测量队勘测、桂林专署水利科设计。坝址位于二排河上游头排乡雅当村附近。集雨面积 3.3 平方公里。枢纽工程为溢流污工重力坝，高 3.6 米，长 68 米。设计引水流量为 2 立方米 / 秒。干渠长 9.42 公里；支渠 5 条，共 17.92 公里。附属工程有渡槽 4 座、分水闸 4 座。设计灌溉农田面积 1.6 万亩，主灌头排区的二排、头排及四排区的三排等 3 个乡的农田。1956 年 6 月动工，1957 年 4 月，坝首、渠道工程全部完工。1983 年，由于头排区划归金秀瑶族自治县，此工程亦划归该县管理。

高岩电力抽水站

位于雒容镇高岩村洛清江畔，为三级抽水站。一级站建在高岩村，为钢筋混凝土深井泵房。底板高程 67 米，出水口高程 93 米，净扬程 27.8 米，圆筒直径 13 米。出水口 3 条，内径 1 米，管长 60 米。出水量 4.59 立方米 / 秒。二级站建在满榄村，出口高程 100 米，净扬程 19 米，出水管 5 条，内径 0.5 米，出水流量 1.8 立方米 / 秒。三级站建在中雷村，出口高程 120 米，出水流量 0.66 立方米 / 秒。一级站总干渠长 10.25 公里，水深 1.8 米，过水流量 4.32 立方米 / 秒。南干渠长 8.11 公里，水深 0.9 米，过水流量 1.19 立方米 / 秒。北干渠长 4.3 公里，水深 1.5 米，过水流量 2.51 立方米 / 秒。二级站渠道长 14.7 公里，水深 1.4 米，过水流量 1.18 立方米 / 秒。三级站渠道长 10 公里，水深 0.8 米，过水流量 0.66 立方米 / 秒。全工程支渠 29 条，长 65.66 公里。大小附属工程 229 座。一级站装机容量 3 台 / 1710 千瓦，二级站装机容量 5 台 / 575 千瓦，三级站装机容量 2 台 / 120 千瓦。设计总灌溉面积 8.33 万亩（其中水田 4.17 万亩，畲地 4.16 万亩）。总投资 304.17 万元。

九牛冲电力抽水站

位于城关乡波井村九牛冲，距县城 2 公里。工程为二级站。一级站建有电机厂房 1 座，厂房建于洛清江边。吸水池 1 座，池底板高程 74.63 米。防洪挡水坝 1 座，最大坝

高 18.5 米，坝顶宽 5 米、长 103 米。装机容量 3 台 1240 千瓦。出水口净扬程 27 米，出水流量 2.38 立方米 / 秒。排洪电动机 1 台，装机容量 55 千瓦。二级站 2 处：独羊二级站距一级站 16 公里，建有机房 1 座，装机容量 2 台 270 千瓦，进水底板高 94.4 米，净扬程 19.6 米，出水口高程 116 米，出水流量 0.74 立方米 / 秒。马场二级站有电机房、吸水池设施，进水底板高程 96.5 米，净扬程 19.5 米，出水高程 116 米，出水流量 0.37 立方米 / 秒。总干渠长 24.8 公里。独羊二级站干渠长 14 公里。附属工程有水槽 6 处，其中跨铁路渡槽 1 处，长 64 米、反洪管 1 处，直径 1.4 米，从石榴河河床底通过，长 320 米。其它附属工程 142 处。分别由中南区公司、柳铁第二工程队、省劳改局承建。县水电局组织于 1963 年 11 月 3 日动工。1964 年完工；同年 8 月 26 日，机电安装完工。独羊、马场两个二级站因延期施工，1966 年 6 月 13 日始试机抽水。设计灌溉农田面积 3.35 万亩，实灌 0.22 万亩，只占设计面积的 6.6%。总投资 220 万元。按实灌面积计算，每亩投资 1000 元。

马步水库

位于雒容连丰村马步屯田洲山溪峡谷口。1956 年由桂林专署水利科设计。库区集雨面积 18.3 平方公里。最大坝高 19 米，坝顶长 115 米、宽 4 米。副坝 2 座，输水管 1 座、溢洪道 1 座（宽 20 米、长 70 米）。总库容 1327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886 万立方米。泄水管最大流量 22 立方米 / 秒。总干渠长 0.45 公里。干渠两条，长 21 公里。支渠 15 条，长 16.96 公里。其中，三面光防渗渠道长 6.45 公里。渡槽 1 座，长 189 米。1957 年 12 月 13 日动工，1958 年 3 月完成主坝填土任务。之后，由于洛清江里定拦河坝兴建，渠道停建。1962 年续建渠道工程，并进行坝首加固。1965 年，配套工程全部建成。总投资 58.15 万元。设计灌溉农田 1.16 万亩。库区淹没稻田 1247 亩，搬迁民居 427 人，搬迁安置费共支付 7.5 万元。

龙母水库

位于江口乡长洞村卡旁河上游。县水电局勘测设计，为蓄水、发电、防洪除涝综合工程。集雨面积 21.5 平方公里。河流多年流量为 0.54 立方米 / 秒；最枯水期流量 0.02 / 秒。总库容 1130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881 万立方米。枢纽工程由重心力坝、放水塔、有压放水管、坝首电站组成。溢洪坝顶高层分别为 196.5 和 198.5 米。大坝最高 38.75 米。放水塔为框架钢筋混凝土结构，高 24 米。压力放水管直径 1.2 米，管长 26.5 米。进口底部高层 171.8 米。启闭机平台高程 198.5 米。通过流量 2 立方米 / 秒，坝首装机容量 100 千瓦。干渠长 9.3 公里。支渠 4 条，共长 27.4 公里。设计灌溉面积 1.75 万亩。1980 年实灌 8800 亩。1975 年 12 月上旬动工。1978 年坝首竣工。1981 年全部工程完工。总投资 385.1 万元。库区淹没稻田 650 亩、旱地 70 亩、森林 450 亩、林区公路 4 公里、民房 106 间，搬迁 288 人。

洛清江里定引水工程

位于黄冕乡里定村洛清江上游与永福县交界处。1958 年 9 月，由桂林专署水利科勘测、柳州专署水利局设计。主坝高 23 米，船闸 1 座，水渠长 2.6 公里，正常通水量 20.7 立方米 / 秒。大坝上游淹没稻田 1592 亩、房屋 72 间，搬迁 718 人。渠道工程分总干渠和东、西干渠。总干渠长 42.3 公里，渠底宽 10 米，水深 2.76 米，通水流量 22.8 立方米 / 秒。西干渠长 64.9 公里，水深 2.6 米，渠底宽 5.2 米，过水流量 11.1 立方米 / 秒；东干渠长 98 公里，水深 2.75 米，渠底宽 4.2 米，过水流量 6.5 立方米 / 秒。渠道附属

工程有反虹管 3 座，长 960 米；渡槽 15 座，长 1600 米；斗门 331 座。设计灌溉面积 14.6 万亩。工程造价 858.7 万元。1958 年 10 月 20 日动工。上工人数，最多时达 6 万人。坝首、渠道全面施工。在坝首施工过程中，曾用“炸土炮楼填土法”填土合龙，但未凑效；尔后采用“沉船法”终于合龙成功。1960 年春，坝首及排洪道竣工，共耗资 430 万元；而渠道工程因工程量大，竟未完成十分之一。同年 9 月，工程停建，至今仍未获得灌溉效益。

黄冕水轮泵站

位于洛清江上游。拦河坝建于高浪滩，为抽水灌溉、发电综合利用工程。右岸建水轮泵大坝 1 座，安装 100 型水轮泵 1 台；紧接水轮泵大坝，装机容量 3 台 2400 千瓦。左岸建水轮泵站 1 座，长 10 米，安装 100 型水轮泵 2 台，一台用于抽水，装机容量 200 千瓦，设计灌溉面积 0.86 万亩；另一台用于发电。1968 年 9 月动工，1970 年完工。1980 年 4 月，第一台机组发电。同年 7 月，加高 35 千伏安输电高压线至县城。1981 年 7 月，第二台机组发电。1987 年 6 月，第三台机组发电。

江口电站工程

位于洛清江下游之江口乡洛子屯附近，为抽水灌溉、发电综合利用工程。由柳州水电局设计院设计，自治区水电厅建筑工程处承建。枢纽工程有主坝、水轮泵室、船闸、发电厂房等。1968 年 10 月动工修筑雒容至工地公路 16 公里。1969 年 9 月建坝。1970 年停工，1971 年续建。1977 年，两岸配套工程完工。发电厂基脚完工后，因改变设计方案而作废，船闸因资金短缺而取消。这期工程，共完成挖填土方 47.4 万立方米、开石方 5.8 万立方米、浆砌石 6.75 万立方米、混凝土 1.6 万立方米，花费劳动工日 275.5 万个。随后，因资金不继而停工。

1984 年 4 月 19 日，再次续建动工。计划投资 1300 万元（其中水利厅补助 430 万元，县自筹 375 万元，贷款 495 万元），之后投资增至 1855 万元。1987 年 4 月 19 日动工。其中位于雒容石贵村的电站配套工程开关站，装机容量 2×4000 千伏安，35/n 主变压器，1988 年动工，1989 年 11 月完工，投资 280 万元。仅江口电站至开关站的输电线路长 12 公里，耗资即达 43 万元。全工程 1990 年 8 月土建完工，共开挖石方 5.9 万立方米。装机容量 2×3750 千瓦，平均年发电量 3840 万度，年利用时间 5130 小时，枯水期保证出力 1550 千瓦。电站厂房为升压站，房顶高程 98.5 米，分为 7 层。水轮机为 C999-W932，配用 SEGW3750-44/3640 发电机，辅机设备为 NOS 型微机双调电液调速器、MCE-3 型程控装置。微机点控系统硬件由美国引进，实现机组调速、有功无功调节，开机停机、开网操作、故障巡视等微机化、自动化。在电站厂房第三层，安装电动抽水机 2 台，每台 35 千瓦，出水流量 0.25 立方米 / 秒；枯水期以电动抽水机代替水轮泵抽水灌溉农田。

响水电站

位于洛清江上游之中渡镇响水村地段，此段河床落差 12 米。原为鹅卵石垒成之简易引水坝。1963 年扩建，加高坝首，修建了 10 公里三面光砌石渠道。电站建于河岸半山上，绕山开渠 1.15 公里，水头共达 17 米，引水流量 3.2 立方米 / 秒。装机 3 台 700 千瓦（其中一台 200 千瓦作备用）投资 37 万元，10 月建成发电。

鹿寨县的两次水利建设高潮

●蔡传清

鹿寨县解放前水利设施较少，水稻种植多为靠天，一旦遭受严重干旱，即形成严重饥荒。1946年因严重干旱而闹饥荒，平民百姓靠剥树皮、挖草根作粮度日，不少人饿死荒郊，惨不忍睹。解放前夕，全县（原雒容、中渡、榴江三县合计）水田保水面积约5万亩，占全县水田总面积的12%。

解放后，县委、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每年冬季都要投入大批的领导和干部力量、劳动力、资金、物资等进行水利建设，其中曾经出现过两次水利建设高潮：第一次从1955年开始，连续三年多；第二次是1965年为期一年多。两次水利建设高潮，大大地改善了鹿寨县农田灌溉条件，促进了水稻生产的发展。

第一个高潮，从1955年冬起到1958年冬，全县在此期间建成大小蓄水工程120处，总库容4680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4.338万亩，比解放前夕蓄水工程总库容增长3.5倍。在这些蓄水工程中，有中型水库1处，小一型水库5处，小二型水库47处。鹿寨县所有的蓄水工程，有一半是在此期间建设的。与此同时，还修建了两处较大的引水工程，即二排河、石榴河引水工程。这两处引水工程灌溉面积共2.79万亩，与其它蓄水工程共灌溉面积合计7.12万亩，比解放前的总灌溉面积还多出2万多亩。此期间兴建的水利工程，其特点是：投资、投工少，灌溉面积大。当时，每亩灌溉面积平均投资30~45元（到了七十年代，每亩平均投资340元），所灌溉的田亩，平坦、土质好，如石榴河、马步水库灌区，多数为大片较平坦的稻田。这些稻田因解决了水的问题，为水稻的高产稳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之所以形成波澜壮阔的第一个水利建设高潮，既有其自然的客观原因，也有政策的原因，主要是：一、合作化后，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兴修水利投资投工较大，当时县财政底子薄，国家拨款只能解决一部分，要想在一个冬季同时修建几项大的工程，没有集体力量，没有群众运动是不可能的。农业合作化的实现，为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提供了资金和劳动力条件。为了大规模进行水利建设，县委贯彻了“社办公助，费省效宏”的原则，鼓励农业社大搞水利，国家给予资金补助。此期间水利投资共888.49万元，其中社队自筹301万元，占总投资的33.88%；此外还有许多的廉价劳动力，如农业社参加马步水库建设，国家给予参加劳动的社员每人每天补助伙食费1角钱，其它由农业社自理。二、连续干旱，促进了领导大搞水利的决心。1953年，全县早晚稻受旱面积14.85万亩，占播种面积的67.5%；1954年，又遇严重干旱，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的58.6%。连续两年，水稻减产。1955年，我国已出现了经济建设高潮，然而粮食远远没能满足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影响了经济发展，粮食生产成了全党全民的首要任务。要解决粮食生产问题，就当时鹿寨的实际情况而言，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水利问题，所以兴修水利就成了当务之急。三、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党全民斗志昂扬，积极参与水利建设。当时，不仅广大农业社社员有搞水利的任务，就是机关干部、企业职工都分配有任务。1957年，马步水库破土动工后，县委要求机关干部、职工，每人要到工地完成15个工作日的任务。当时我们单位的同志也参加了兴修水利的劳动。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连续17天都在工地吃住。由于缺乏蔬菜，大多数时间是吃豆腐乳送饭。2000多民工，常常加班加点，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完成了主坝的填土任务，如果没有“冲天”的干劲，是无法做到的。

第二个水利建设高潮是在“四清”运动中掀起的。1965年8月，鹿寨县开展了系统

“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由柳州地委抽调来宾、忻城、金秀、象州等县及自治区、地区机关和人民解放军与本县共 3400 多人，组成“四清”工作团，把队员分派到每个生产队，有的生产队达 2~3 人。“四清”工作团提出了搞好运动的标准，除了“四清”外，最主要的落实到生产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兴建水利工程，改善原有的水利设施，大幅度扩大水田灌溉面积，并分配了一定的扩灌指标，运动结束达不到指标的，由所在社队的工作队留下来继续完成。为了完成工作团下达的任务，行署将当年水利投资预算资金、物资，大部分都分配到了鹿寨。为了调动社队投资的积极性，工作团采取了国家拨款，社队按一定比例投入配套资金的办法，社队投入多就可以多争取到国家的拨款，从而调动了社队兴修水利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各社队“四清”工作队为了自己所在队实现生产达标，亦积极地投入到兴修水利的工作中去。他们发动群众，全面进行勘察、规划，开展了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联合修建；一些小山塘水库，则由生产队独立修建。1965 年冬，全县兴修水利全面铺开，直至 1966 年 8 月“四清”运动结束，两个兴修水利年里共投入资金 744.41 万元。这是解放以后水利建设投资最多的时期，其中社队自筹资金 260 万元，占总投资 35%。在此期间，共建成小二型以上水库 23 处，生产队自建小山塘水库一批。由于灌溉面积扩大，早晚稻种植面积亦迅速扩大。1966 年，全县早稻种植面积达到 29.74 万亩，比 1964 年的 23.75 万亩扩大 5.99 万亩，扩大 25.2%；二苗种植面积 27.95 万亩，比 1964 年的 22.34 万亩扩大 5.61 万亩，扩大 25.1%。由于复种指数增加，全年粮食产量亦上了一个新台阶，获得了大增产。1966 年粮食总产 9257 万公斤，比 1964 年 7521 万公斤增加 1736 万公斤，增产 23%。

两次水利建设高潮，先后共历时 5 年，建成的蓄水工程占全部工程的 76%。此外，两处大型的电动水轮泵抽水站——雒容高岩、城关九牛冲电灌站，是在经历 1963 年的大旱后于 1964 年兴建的，虽不算全县性质的水利高潮，但也是集中全县劳力、财力，在自治区、中央支持下修建的。

鹿寨县解放后水稻生产的两次大失误

● 蔡传清

水稻生产按传统的栽培技术即是育苗移栽，而水直播（也叫水点播）则是将谷种浸泡后，直接播到大田里去。这种水直播栽培技术，鹿寨县曾两次大面积推广，而两次均造成了减产。

1958 年，鹿寨县各地掀起了“大跃进”高潮，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为了抢上季节，实现水稻增产，全县采用了当时认为是“先进栽培技术”的水直播，并大面积推广，当年早稻水直播面积约 4 万亩。播种后，经过一个多月的生长，稻田一片绿油油，但却无法分辨哪是禾苗，哪是杂草。为了除草，采用水直播的生产队几乎集中了全部劳动力，没日没夜地拔，有的禾苗与杂草混合生长，则一同拔除，然后再选出禾苗栽上。由于除草需要劳动力太多，护理不过来，有的田块无法除草，造成严重失败。1958 年上半年，雨水比较正常，但推广水直播却造成了减产。

由于有了这一次深刻的教训，1958 年后在长达 14 年的时间里，不再采用水直播这一栽培技术。然而，到了 1972 年，它又被领导提到了议事日程。也许人们不甚理解：难道 1958 年的教训还不深刻吗？为什么又要搞呢？曾在县农业生产办公室工作过的笔者，对这一次推广水直播的过程略知一二，将这段史料如实地记载下来，为的是从中引

起我们的反思。

1972年3月，县“革委”召开了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布置农业生产，提出一定要在今年建成大寨式的县，实现粮食跨《纲要》，粮食总产量要按全县水田面积平均亩产达到800斤。在此次大会上，并没有提出要搞水直播，只提出一般的增产措施，如扩大面积，增施肥料，抢上季节等等，但特别强调并要求5月1日前基本插完早稻。大会之后，出现了严重干旱，许多地方无水耙秧田。尽管当时采取“小苗带土育秧”（即地埂、坨埂育秧），但面积小，播秧进度十分缓慢，到3月10日，全县播种仅占应播种总数的5%，而干旱仍有持续发展的迹象。为了抢上季节，县领导开会，吸收农业技术干部参加，商讨对策。在此情况下，又提到了水直播，认为要抢上季节，避开育秧这一环节，搞水直播是一条很好的出路。

会上，一些经历了1958年搞水直播有深刻教训的同志，大打问号。主张水直播的同志则认为，现在的情况与1958年不同了，我们县近两年都有一些生产队自行小面积水直播种植，获得了增产；而水利、劳动力、肥料都比1958年多，完全可以搞。水直播究竟能不能搞？能搞多少？主要领导拿不定主意，会议并没有决定推广水直播，而是先行参观总结，一方面派人到广东参观，另一方面到我县曾试搞过水直播的生产队进行总结。这两路人马反馈回来的信息，都认为可行。于是，县里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推广水直播。开始时，决定按37万亩早稻计划面积搞30%，后又提高到50%，最后决定搞70%，即26.6万亩。3月17日，以电话会议的形式，传达了县“革委”这一决定，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并提出：推广水直播是一场革命，每个领导干部都要在这场革命中接受考验。电话会还提出了分三批完成任务的要求：第一批3月底完成15~20%，即5.5~7.4万亩；第二批清明前达到45~55%，即16.6~20万亩；第三批4月10日前全部完成。

为落实26.6万亩水直播的种植计划，县“革委”还采取了如下措施：1、召开现场会。3月20日，召开了公社书记、农业技术干部参加的现场会，参观了城关、龙江、寨沙、四排等一些生产队过去两年水稻水直播获得增产‘今年又继续水直播的现场；2、大力抗旱。全县所有的抗旱工具全部行动，投入抗旱，由县拨一部分柴油支援抗旱；3、奖励化肥。一亩水直播奖励尿素5斤；4、组织庞大的工作队下乡。从县、社直属机关共抽出275人下乡，加强对水直播生产的领导。

虽然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对水直播推广也有一定进展，但起色不大。到了3月29日，水直播仅完成11902亩，占任务的3%左右，与原订计划相差甚远。其原因除干旱外，就是生产队干部和社员思想不通，不愿种植。各地领导、工作队反馈回来的信息是：

1、无法解决清除杂草问题。稻种直播下大田后，禾苗与杂草一同生长，杂草比禾苗生长快，到可以除草的时间，满田都是杂草，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个别生产队进行试验获得增产，那是面积小，可以应付除草问题。如果大面积推广，按当时的条件，要解决除草问题几乎是办不到的。

2、涉及口粮，生产队干部、社员不干。1958年人民公社化，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社员在集体食堂开饭，口粮由大队统一拨到食堂，因此粮食增产减产与社员无关，上级叫怎么做就怎么做。现在不同了，实行小队核算，减产损失是小队的，涉及到社员口粮，要搞也只能搞点试验。

3、肥料不足。当时主要靠农家肥，即使除草问题得到解决，肥料不足也难增产。

由于推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为进一步弄清实际情况，领导们分别下到不同地方进行调查，发现一些无水利保障的田块，谷种直播下去，田已开裂，小苗已经枯萎；有些排水不好的田，水深了禾苗长不起来。经开会研究，认为原订70%的计划脱离实际，不

能一刀切，应根据各地不同条件，提出不同的推广比例。为此，又提出了以下要求：水利条件好的可搞 30~40%，条件一般的可搞 10~20%，水利条件差的可搞些试验，深水田可以不搞。同时，强调要做好思想工作，不搞强迫命令；经做工作后，队干、社员思想工作仍不通的，由他们自己选择。总的要求，无论采取哪种栽培方法，务必要抢上季节，完成种植计划。

在水直播推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同一剂“清醒剂”，让领导们清醒了许多，改变了原来的要求，可是一些原来对推广水直播劲头大的地方，并没有松口，也不再去做思想工作。

当年水直播面积达 12.19 万亩，占实种面积的 33.4%。在田间管理中，凡是推广面积比较大的地方，再一次尝到了苦头，杂草与禾苗并茂，全队劳动力全力以赴拔草也应付不过来，有的队三四十个劳动力，一天还完不成 1 亩的除草任务。由于护理不过来，加之肥料不足，凡是水直播的田块，大部分减产。1971 年，全县早稻产量 6739 万公斤，1972 年 6415 万公斤，减收 324 万公斤，减收 5%。

鹿寨县水稻品种改良记

●沈光明 / 整理

解放之初，鹿寨县境内水稻播种多采用传统稻种。其中：早稻有 60 早、70 早，晚稻有黄壳油粘、白壳油粘。这些品种多为高秆、早熟、穗短，产量较低。据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农业部门调查，水稻平均亩产仅为 91 公斤。因此，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曾推广由广西省农业部门培育的广西早禾 1 号、2 号、14 号等新品种，产量略高于传统品种。

在传统的水稻品种中，米质优良的晚稻有老鼠牙粘、大糯、香梗糯。老鼠牙粘，比一般的米粒小，两头尖细，其米饭软而香，但比一般品种的米饭量少二至三成，多为富人食用，故又名“富贵米”。大糯，米粒稍圆而大，饭质软而粘，是制作糕点的上等原料。香梗糯，类似大糯，做饭香，稍粘。据民国二十二年雒容、中渡、榴江三县的统计，当年大糯产量达 62306 担，香梗糯 16667 担。

解放后，鹿寨县引进、推广、培植水稻良种，曾经有过三次大面积的更新换代。

第一次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引进推广胜利粘、马房粘、解放 1 号、16 白花粘等，产量比传统品种每亩平均提高 15~20 公斤；但均为高秆品种，易倒伏，种了几年，即被淘汰。

第二次是 1958 年到 1977 年间，针对高秆、倒伏问题，推广“广矮”等中秆品种，先后引进过 300 个品种，经区域试验，从中筛选出 34 个。其中：早稻有矮脚南特、珍珠矮、广水 1 号、广宁矮、广选早等 20 多个品种；晚稻有团结 1 号、朝宁 11 号等 10 多个品种。1977 年，据县种子站普查统计，全县 10 个公社中（江口公社未统计），共留矮秆早稻良种 472 万公斤，占应留种子的 91.9%；共留晚稻中、矮秆良种 238 万公斤，占应留种子的 93.6%。早、晚两糙均基本实现中、矮秆品种优化。其中，朝鲜粳稻、红米粳稻均为中秆早熟品种。朝鲜粳稻，米质尚佳，入口粘软，但因产量不高，出饭率低，因此有的生产队种了一两年后，即被淘汰。红米粳稻，米质粘软，也因产量不高亦被淘汰。

第三次大面积推广水稻良种，是从 1977 年开始的，主要推广杂交水稻。1973 年进

行了小区试验，亩产比常规品种增 150~200 公斤。因此，1974 年县农业部门即派人前往海南岛参加水稻“三系”（即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协作繁殖。1975 年，分别在城关、雒容、鹿寨镇、县农科所进行“三系”制种繁殖试验；同时办了三期制种培训班；还派人到博白县石碑坪农场进行制种。1976 年全县推广种植杂交稻 90000 亩（含早、晚稻）。1977 年，铺开制种生产。当年制种面积 4338 亩，收获杂交稻种 36211 公斤。1978 年，因气候因素，转移到武宣县通挽公社制种。去了 500 多人，制种面积 2870 亩，产杂交稻种 60812 公斤。翌年，全县种植杂交水稻 48337 亩，平均亩产 443 公斤（生谷），比常规品种每亩增产 194 公斤，增长 77.9%。

1981 年，全县停止制种，所用稻种全由外地调进。因此，杂交稻播种面积逐年减少。至 1984 年，全县杂交稻播种面积仅为 8200 亩。1985 年后，全县有 1.5 万亩水田改种经济作物，水稻播种面积减少，产量下降。1987 年，县种子站从外地调进杂交稻种 74.5 万公斤。当年，全县早晚二季杂交稻的播种面积达 38.1 万亩，占水稻播种面积 67.8%。当年全县总产稻谷 16244 万公斤，比 1982 年 14000 万公斤增加 2444 万公斤；比 1953 年（土改前一年）全县粮食总产量 6535 万公斤增加 9709 万公斤，创鹿寨有史以来稻谷产量的最高纪录。

（根据县农业局相关资料整理）

鹿寨县农具革新录

●沈光明 / 整理

解放初期，鹿寨县的农业耕作、收获工具，主要是传统的锄、刮、犁、耙、木滚、禾镰、禾桶、石滚、蔗刀等等。用手工操作，劳动强度较大。

1953 年，县农机部门开始推广新式农具“五三”步犁，1957 年又推广“双轮双铧”犁，均因笨重而推广不开。1959 年推广“五九”步犁，大约有一半生产队使用，但最终还是因为笨重而被自然淘汰，恢复使用传统木犁。

1956 年，成立县拖拉机站，有中型拖拉机 5 台。1957 年 6 月，广西省人民委员会下文通知，改“鹿寨县拖拉机站”为“广西‘八一’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由省管理，进行扩建。其时，拖拉机增至 14 台。1959 年大、中型拖拉机增至 30 台，还从苏联进口水稻联合收割机 1 台。当年该站为生产队代耕土地 9.6 万亩。1966 年开始使用手扶拖拉机，当年生产队自购 4 台。1969 年，“八一”拖拉机站因经营不善，连年亏损而裁撤，将所有机械全部下放给各公社。是年，各公社又自购中型拖拉机 16 台，其中城关公社 8 台，中渡公社 3 台，鹿寨镇公社 2 台，雒容、平山、头排公社各 1 台。至此，全县共有大、中型拖拉机 33 台 / 1272 马力、手扶拖拉机 27 台 / 244 马力，机耕面积 45.718 亩，占当年播种面积 4.6%；并拥有人力插秧机 2500 多台。

1971 年后，耕作机械逐年增加。至 1973 年，大、中型拖拉机已发展到 135 台、手扶拖拉机 130 台、插秧机 2816 台。

1974 年，广西制造“机滚船”，城关、四排、头排三个公社共购置 4 台。

1976 年，广西生产“广西 76 型机动插秧机”，雒容公社率先购进 1 台，次年增至 16 台。1978 年后，此机逐渐被淘汰。

1983 年后，主要耕作机械逐年增加。据 1987 年统计：全县已有手扶拖拉机 2154 台 / 196094 马力，比 1979 年增加 789 台，增长 57.8%；已有机滚船 413 台 / 1667 千瓦，

比 1979 年增加 360 台，增长 6.8 倍；已有中型拖拉机 399 台 / 11050 千瓦，比 1979 年增长 4%；已有大型耕作机具 413 台（套）。全县机耕面积达 20.1 万亩，占总播种面积 24.5%。

1958 年，县农机修造厂研制生产水稻收割器 1000 把，部分生产队曾经使用，但没有推广。

1959 年，县农机修造厂仿制解放前使用过的人力打谷机 100 台，因使用不便亦未推广。

1966 年，推广使用带桶人力打谷机、电动打谷机。当年生产队购置人力打谷机 28 台、电动打谷机 24 台。之后，逐年推广。至 1979 年，全县已拥有人力打谷机 6169 台，有 80% 的生产队使用。

1982 年，出现的轻便型打谷机，更为适应家庭联产承包制后之分户使用，因此至 1987 年全县已拥有 29272 台，比 1979 年增加 3.7 倍。

此外，上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全县还普遍推广使用由农家自制的简易梳虫器，用以捕捉水稻发生的稻苞虫；还普遍推广使用制作简易的耕田器，用以减轻传统的用脚耘田的劳动强度。

（据县农机局相关资料整理）

杏林春秋

鹿寨县人民政府卫生科（局）体制变更概况

鹿寨县人民政府卫生科始建于 1952 年 10 月，首任主管副科长黄蔚民。此后，有多次体制变动。

1958 年 4 月 15 日，县卫生科与县文教局合并，成立县文教卫生局，下设卫生股。

1959 年 3 月，县文教卫生局撤销，设立中共鹿寨县委员会文教卫生办公室。

1960 年 5 月，设县人民委员会卫生局。初时，办公地址设于县人民医院，后迁回县人民委员会大院。

1963 年 10 月，县卫生局改为卫生科。办公地址在县城码头巷 73 号。

1966 年 9 月 6 日，县卫生科与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县卫生防疫站、县妇幼保健站合并，成立县人民政府卫生局。下设局办公室、防疫组、妇保组、计生办，分别统理全县医政药政、卫生防疫、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等工作。

1968 年 3 月 21 日，县卫生局成立革命领导小组。

1969 年 5 月，县卫生局革命领导小组与县人民医院合并成立鹿寨县医院革命委员会。下设办公室、防保股、医务股、总务股。办公地址在县人民医院内（计生办已分出独立办公）。7 月，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设立卫生小组。

1970 年 1 月，县革命委员会卫生组，办公地址在县革命委员会大院内。

1971 年，县革命委员会卫生组改称为县卫生局。

1981 年 5 月 20 日，再次改称为鹿寨县人民政府卫生局。地址设在县城十字街 64 号。

1984 年 7 月 14 日，随着机构改革，调整充实了县卫生局领导班子，下设办公室、人事秘书股、业务股、财务股。代管鹿寨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附设中国红十

字会鹿寨分会、鹿寨县卫生工作者协会。

(汤英能 / 覃德礼 供稿)

鹿寨县区、乡（镇、社）卫生院（所）机构变更概况

建国前，鹿寨县域内的鹿寨、黄冕、龙江、洛埠、江口、运江、安安（今寨上村）、平山等乡镇设有医务所。每所只有所长 1 人，均为中医师，银俸微薄，多兼职在外行医。1948 年 2 月，原榴江县政府卫生院派 2 名医师赴鹿寨、黄冕成立分院，一年多即裁遣。

建国后，三县合并时，原榴江、雒容、中渡卫生院就地改称区卫生所。1952 年 12 月，平山、江口、四排 3 个区成立卫生所，每所有公职医务人员 2—4 人。至 1956 年底，黄冕、屯秋、龙江、头排 4 个区成立卫生所。至此，全县 10 个区均有了卫生所，总共有公职医务人员 32 人。

1958 年后，随着人民公社化，区卫生所与“联合诊所”合并成立公社医院，共有职工 129 人。

1962 年，随着政社体制的变更，将原有国办的 14 个卫生所 78 名干部、工人转为集体办的“联合诊所”。1966 年 1 月又转为国家办的区卫生所。5 月，再改为公社卫生院。鹿寨镇卫生院划归县人民医院称第二门诊部。同年 9 月，自治区卫生厅拨款 3300 元，给寨沙、中渡两院增设病床 15 张，改称地段医院。

(覃德礼 供稿)

雒容联合诊所的变迁

●彭卓越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雒容镇上有仁寿堂、怀德堂、保元堂几家私营药店，约有 5、6 位中、草药医生坐堂问诊。群众患病，一般由医生开处方后到药店买药。当时，西医药尚未推广应用，西药寥寥无几。直至 50 年代中期，这里才逐渐开展西医药治病业务。

1954 年初，为了贯彻中西医结合的方针，经业主多方讨论，决定在雒容镇建立一家联合诊所。由彭卓义、傅彩安、陈一钟、叶瑞华、吴玉嫦 5 人投放股份，每人一股。推选彭卓义为联合诊所所长，叶瑞华为副所长。大家商定，诊所租用民生街袁瑞之的 3 间房屋，即时筹购一些急需的器材、药品。当年的 3 月 1 日，雒容联合诊所正式挂牌开业。

诊所草创之时，设有诊室 5 间，即西医诊室两间，中医诊室 1 间，草医诊室 1 间，妇幼诊室 1 间；另外还有外科室、药房、挂号收费处 3 间。医务人员安排为：中医彭卓义，草医傅彩安，西医陈一钟、叶瑞华，妇幼吴玉嫦，外科刘文明，药房谢卜三，挂号收费张泽民，总共 8 人。那时，诊所的西医，最先进的器材莫过于有一台显微镜，用以检查病菌。中草医师不仅用中草药治病，还使用针灸、拔罐及针刺穴位电疗。到了 1958 年，诊所又增设了简易病床 5 张，供患者留医；还购买了进口单车两架，供医生出诊和外勤防疫人员使用。上世纪 50 年代，雒容地区的防疫工作大部分由诊所人员负责。

在当时，雒容联合诊所与县内同级医疗诊所相比，算是人员较多、设备较完全的了，中医、草医、西医、妇幼等科室俱有，针灸、拔罐、针刺穴位电疗项目不缺，每年上缴给县卫生局的业务收入金额总在最高等级，首屈一指。

1956年4月，彭卓义到南宁工作，诊所欠缺中医，即选聘彭卓越担任中医门诊医生；同年6月，由彭卓越接任诊所所长。

随着诊所的发展，医务人员也在不断扩充。1957年4~6月间，经上级安排，复员军人陶正明担任药房调剂师，复员军人李肖坤分配到外科室工作。1958年4~6月间，又安排插队青年刘观佑、李云珍担任防疫员，吴凤姣担任接生员。

1958年，全国实行了“人民公社化”。按规划，每个公社都应建立公社医院。雒容公社党委当即决定，将原来的雒容区卫生所与雒容联合诊所合并为雒容公社医院；院长由公社党委委员担任，由彭卓越担任副院长。从此，雒容联合诊所遂不复存在。

黄冕乡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期

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

● 韦德昌

解放初期，黄冕乡只有“阳毅夫私人诊所”、“张励文接生站”、“陈十二私人草药店”和张幼嘉、徐国英、沈立昌等几个坐堂中草药医师。方圆百十里农村缺医少药，群众看病难，求医难，遇上大病重病更是难上加难，只能听天由命，求助于巫婆道公和神灵保佑。那时候，天花、霍乱、麻疹、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症”）、白喉、疟疾等传染病广为流行，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1956年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农村缺医少药这一突出的状况引起了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重视，选派了一批医护人员到农村去。从县人民医院派出的池景龙、彭先珍和我，创办了黄冕卫生院。虽然派出的医疗小分队经常深入黄冕乡各村屯进行巡回医疗和开展疾病防治，但医务人员的缺乏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从实际出发，就地培养一支扎根农村的乡村医生队伍，才能满足农民群众看病难的需求。这事，得到了乡党委和乡政府的支持。

我们首先在黄冕镇上建立了“卫生工作者协会”，把全乡闲散的个体医师组织起来，成立“联合诊所”，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极大地调动了他们为群众防病治病的积极性。其次，我们从农业生产队选拔了10名政治思想好，群众口碑好，又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男女青年，到乡里参加“乡村医生培训班”学习。培训班由卫生院的医生轮流授课，还邀请下放到山脚农业合作社劳动锻炼的自治区荣军学校医院的邵世周医生协助授课。学员们白天参加卫生院医疗实践，晚上学习医学基础理论知识，经老师的“传、帮、带”，进步很快。通过3个月的强化训练，学员们基本掌握了医学专业的基础知识。大家表示：回去后一定要为搞好农村的防病治病工作作出贡献。

这支“不走的乡村医生”队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分布在全乡10个医疗保健责任片，每个片负责若干个生产队：孔运喜、张玉萍负责幽兰片，李启梅、李启禹负责六脉片，赖忠汉负责盘龙片，余世铭、余光政负责改江片，罗球英、罗庆星负责大端片，罗小英负责爱国片；古尝片由镇联合诊所的两名医生轮流巡诊。这样，建立了黄冕乡的医疗保健网络，基本实现了村村片片有医生，小伤、小病不出村、不出队，大病、重病原则上不出乡。乡村医生的工资报酬，由所在地的各生产队按本队强劳动力平均最高工分值统筹支付。乡村医生看病只收药品和器材成本费，不附加利润，大大减轻了农

民群众的经济负担，做到了“三满意”，即：农民满意、生产队干部满意、乡村医生满意。

黄冕乡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期农村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成为当时全县农村卫生事业建设的榜样，得到了桂林地区和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检查团的肯定和赞扬。

艰苦奋斗建医院

●李开鑫

黄冕乡卫生院的前身是黄冕卫生所，于1956年7月建立，设在黄冕老街中段的两间三进的庙堂里。当时，有职工3人，设有候诊室、诊疗室、药房和注射换药室。10年后，卫生所改成公社医院，职工增至10人，但限于经费困难——1966年底，院里在银行的存款只有9元；且囿于所在的院址前后左右皆无余地，门诊科室和职工宿舍——哪怕是“鸽子笼”式的宿舍，都无法增设。1967年4月，县卫生局拨款8000元给该院作房屋修缮费。如何使用这笔经费？院长廖建桃组织全院职工展开了讨论。

那天晚上，医院的“四女六男”围坐在煤油灯下，听取了院长的分析：修缮原来的破庙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医院的用房问题，但扩建又无余地；要搬迁新建，这8000元不过是杯水车薪，开支设计费后，连买材料的钱都不够。这事该怎么办呢？大家讨论热烈，各抒己见，赞成搬迁新建的占大多数，认为只有这样，医院才有发展前途。至于迁建的选址、土地和其它一些问题，应争取公社党委给予支持和解决。

院长向公社党委作了汇报请示，公社党委同意了迁建方案，新址选在对河铁路给水站附近，排着公社新址，并与厂底生产队协商，将该队的3亩多畜地无偿拨给医院，且不收青苗补偿费。院里决定，由李开鑫负责设计施工。为了节省开支，院里号召全院职工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积极参加建院的义务劳动。

搞基建需要木材。10多立方米的木材要从鹿寨运回黄冕是个大问题，公路不通，只能从铁路或水路运输。为节省一大笔运费，大家一商量，决定由自己水运。参加水运的有水性较好的共产党员陆如胜，还有党宝龄和古尝大队卫生所的吴庆生。

陆如胜三人带上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和炊具，乘火车来到鹿寨。提货后，他们请搬运社的工人用板车把木材拉到鹿寨码头，自己下水扎木排。经过一个下午的忙碌，木排扎好了。他们把木排托给渔民保管，这才去旅社休息。

第二天清早，陆如胜三人买了9个快餐，还买了2斤“糖泡酒”，吃饱喝足后，把剩下的饭菜和酒带回木排，就开始启航了。木排沿东岸逆水而上，行不到30米，竹篙便插不到河底，只好以篙代桨，想要横渡到水流稍缓的西岸再前进。谁知，他们费了好大的力气，还是被激流冲下了100多米，停靠在堡里村边的河岸。有了这次教训，他们总结出了经验，遇到激流急滩，让一人拉纤，一人撑排头管方向，一人下水推排。就这样，他们闯过了先锋滩、龙兴滩、回龙洲滩……饿了，吃早上剩下的饭菜；渴了，捧起河水就喝。头顶烈日曝晒，晒得人皮肤火辣辣的，小便赤橙如茶；撑篙的手磨破了皮，渗出了血。那个辛苦啊，他们硬是挺住了！三人轮换着工种，终于又闯过了黄冕公社辖区的于杯急滩。这时，夕阳西坠，他们休息了半小时后，又向太平洲进发了……当晚，他们在河滩边停泊，野炊露宿。第一天就走了航程的三分之二，大家心里乐滋滋的，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他们三人起了个大早，乘凉启航。赶到旧街大队吃早饭后，给医院里打了

电话，又继续前进了。不过，在过大明滩和河城滩时，由于劳累，日头又辣火，速度显然慢了不少。可他们还是咬牙坚持，终于在下午顺利地回到黄冕。院里的同事们来到码头迎接，对陆如胜三人十分钦佩，竖起了大拇指。大家立刻把运回的木料抬到工地上去……

这次水运木料，节约了 1000 多元运费，极大地鼓舞了大家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从基建开始到结束，长达半年，全院职工自始至终都参加义务劳动，运沙 7 立方米，筛沙 12 立方米，挑青瓦 4.5 万块，铺水泥路 160 平方米，去古尝大队运桁条 40 根……

新建的卫生院有门诊一栋 216 平方米，宿舍 5 间 10 个房共 122.5 平方米，厨房 3 间共 36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374.5 平方米，造价 8000 元，每平方米的造价为 21.12 元——要知道，当时砖木结构房的最低造价是每平方米 38 元啊！

新建的黄冕卫生院，溶进了全院 10 位职工辛勤的汗水！

平山卫生院由“所”到“院”的发展

●李开鑫

平山镇地处鹿寨县的西北部，是四十八弄的壮族山乡。解放前，这里缺医少药，平山街上仅有一间小小的中草药铺。群众得病后，只能靠中草药治疗。

1952 年，建立了平山卫生所。当时，有医师徐志刚、助产士李式筠和护理员黄凤葵等 3 人。卫生所借用两间民房做门诊，医护人员住的是低矮破烂的偏房，用谷垫简易相隔。医疗设备十分简陋，只有听诊器、血压计、体温针及一般常用的外伤缝合手术包。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医护人员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履行着白衣天使的职责。

1958 年后，随着人民公社化，区卫生所与联合诊所合并，成立公社医院；1966 年 5 月，改为公社卫生院。

1967 年，县主管部门将全县卫生系统的房屋维修费由以往的分散拨给改为集中拨给，重点扶持一两个卫生院。平山和黄冕分别获得了 8000 元。在当时，算得上如获至宝了！大家再三讨论，一致认为：平山卫生院的旧址维修没有发展前途，维修不如迁址新建，将所得的钱先建好门诊部。当年，就是用这笔款，建起了一栋片石水泥青砖的医院业务用房和三栋宿舍，总面积达 300 平方米。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医学院的大专生和中专生还到充实到基层。当年，广西医学院的毕业生郭森达和叶素琼夫妇及一批中专生来到了平山卫生院，医护人员由原来的 6、7 人增至 17 人。卫生院的设备也相应增加了，能进行胃切、胃修补、脾切等外科手术。这是平山卫生院发展的第一次飞跃。

1984 年，平山卫生院实现了第二次飞跃：获得自治区卫生厅拨款 5 万元、县财政拨款 4 万元，又建成了一栋钢筋混凝土三单元三层宿舍楼。职工又增加到 23 人。

1992 年后，平山卫生院又有了新的发展，投资了 18 万元，新建了一栋二层半的门诊综合楼，面积有 268 平方米。职工人数达 28 人。增设了内儿科、妇产科、牙科、中医科、中药房、西药房。医技科室也增加了化验室、B 超室、X 光室。新添了 200 毫安 X 光机 1 台、病床 20 张、救护车 1 辆。之后，又专设了防保科。行政村设立了卫生所，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原则上不出乡镇。新法接生率达 98%，冷链接种率达 98%，有效地防治重大疾病的流行，对全镇 2 万 8 千多人民的健康提供了保障。

去黄冕普种牛痘

●刘仕金

1952年冬，鹿寨县也和全国一样，普种牛痘，预防天花。我被派往黄冕区，负责组织接种工作。

那时，黄冕区没有卫生所，只有些开业的中医师和一个西医师。我到那里后，开会宣传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意义，培训他们种牛痘的方法，然后给他们分配种牛痘的任务。这些医师平日在家开门诊看病，闲日才下乡种痘。可是，他们找出种种“理由”，不愿到边远的村屯去，尤其不愿去山高路远、地少人稀的爱国瑶乡。我只好一个人到那里去，挨家挨户地按人接种。爱国乡在旧社会天花流行严重，所属的冲腊村几乎找不出一个不麻面的人。7天后，我进行复查，对那些种了牛痘不发（无反应）的人，再进行补种。

从爱国乡回黄冕后，我对那些开业医师的责任区进行了检查。附近村屯种痘的任务虽然完成了，但远的村屯他们还是没有完成任务。于是，我又到那里去进行“扫尾”工作，给群众补种。经过一个半月的努力，总算把任务完成了。

我县发现的第一例血丝虫病

●韦德昌

血丝虫病是通过蚊虫作为媒介传播的。它传播面广，危害性大，同时可并发睾丸肿大、淋巴管炎、象皮腿、不孕不育等多种症状，晚期病人甚至因心肺功能衰竭而导致死亡。国家在制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就早已明确把防治血丝虫病纳入限期消灭的范畴。

过去，血丝虫病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1958年8月进行全县疟疾病大普查，从城关公社龙田大队小井屯一张血片检测中，无意发现我县第一个血丝虫病病例。经过实验室虫种类型鉴别和送柳州地区防疫站实验室标本复查，最后确定为“班氏血丝虫”。这使我们大为震惊，同时也惊动了县委和县政府，从而拉开了我县防治血丝虫病的序幕。县卫生局立即着手从所属各医疗卫生单位和驻县的自治区、地区厂、矿、场医疗单位抽调一批专业人员，组成防治血丝虫病小分队，对城关公社龙田大队各村屯挨家挨户进行病源追踪大普查，结果陆续发现血丝虫病患者。这样，完全可以确定：龙田就是我县第一个血丝虫病流行区。

龙田血丝虫病流行区的发现，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也引起我们在防治血丝虫病问题上的反思：在1958年全民大办钢铁、1959年全民兴修水利，以及走亲访友、婚嫁等人群高密度集中与流动的过程中，龙田作为血丝虫病传染源，其病源体极有可能通过交叉感染，迅速向外大面积扩散。这意味着随之而来的将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的“龙田”相继出现。面对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不容迟疑。县防疫部门对所掌握的资料作了认真分析研究，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出发，首先把防治工作的重点和目标锁定在龙田向周边辐射的角塘、新胜、俄洲、窑上等大队。经过3个多月日以继夜的连续奋战，上述大队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血丝虫病患者，其中俄洲大队的大汾塘片8个生产队发病率最高，微丝蚴检出率竟占总人口的22%。甚至个别病人的一张血片，惊人地检出微蚴虫50~60条。

为了进一步摸清我县血丝虫病的流行区域、流行趋势、流行特点，为今后制定防治方案提供科学依据，县卫生局及时召开了全县卫生院、站、所的领导会议，并邀请驻县的自治区、地区厂、矿、场医疗单位负责人参加，通报了上述情况，布置了以公社、厂、矿、场为单位进行血丝虫病大普查的任务。结果，又先后在头排公社的解放村、城关公社的思贤村、平山公社的屯秋村等 16 个村屯发现血丝虫病患者。至此，我县被列为柳州地区血丝虫病流行县。

之后，我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开展群防群治，不断巩固战果，防止血丝虫病新发、复发，严格按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预期目标，完全彻底地消灭血丝虫病。1987 年 7 月，我县提前通过了自治区的考核验收，在全县范围内实现基本消灭血丝虫病这一目标，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基本消灭血丝虫病的先进县。在全区基本消灭血丝虫的工作中，笔者和 30 多名医疗卫生工作人员被自治区卫生厅评为先进工作者。

鹿寨县麻风病流行简述

●覃德礼

据《广西年鉴》第三回统计：1937 年中渡县有麻风病人 1 人；1940 年中渡县有麻风病人 2 人（未经普查，仅凭卫生所诊断）。

1960 年，鹿寨县成立了皮肤性病防治站（最初称“麻风村”），专业承担麻风病防治任务。先后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多次不同形式的调查，包括全民普查、疫源地普查、病属普查和线索调查等，基本摸清了全县麻风病流行情况。这样，对麻风病人的集中隔离治疗和社会防治，为最后在全县范围内消灭麻风病打下了基础。

全县确诊的麻风病患者为 235 人，除送自治区皮肤性病防治院和桂林平山医院医治外，本县皮防站共收治 169 人。据此，分析了本县麻风病的流行情况——

一、疫源分布：全县 96 个村、屯、街有麻风病人，其分布如下表：

乡镇名	有病人村（街）	病人数	乡镇名	有病人村（街）	病人数
四排	30	62	中渡	3	4
雒容	12	21	龙江	3	4
寨沙	11	19	黄冕	3	5
头排	9	14	平山	2	2
城关	8	12	拉沟	1	4
江口（包括导江）	7	8	鹿寨镇	7	14

二、发病年龄及性别构成：发病时最小年龄 2 岁，最大年龄 78 岁，最高发病年龄级为 20—30 岁。总病人数中，男性 109 人，占 64.4%，女性 60 人，占 35.6%。男女之比为 1: 0.55。

三、传染关系：全县有麻风病人的家庭共 161 户，总共家庭人口 878 人。其中：有 1 个病人的 151 户，占总户数的 92.27%；有 2 个病人的 4 户，点总户数的 2.48%；有 3 个病人的 2 户，点总户数的 1.24%。父母传子女者 4 人，夫传妻 2 人，妻传夫 2 人，兄、姐、嫂传弟妹 6 人，弟妹传兄、姐、嫂 2 人，亲友互传 3 人，同事互传 5 人。其余 145

例病人的被传染源原因不明，占总病人数的 86.47%。由此可见，直系亲属传染占少数，证实接触麻风病人并不太容易被传染。

四、病型分类：总住院人数中，属瘤型（L）和界线类（B），称为多菌型、传染型共 81 人，占总病人数的 47.91%；结核样型（T）和未定类（I），称少菌型、非传染型 88 人，占 53.09%。

检送麻风病人

●刘仕金

1953 年县卫生院领导分派我担负诊断和调研麻风病人的任务。我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无奈的我只好去请教我的老师——皮肤科教授杨永康。他向我传授了麻风病的诊疗技术，还给我提供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学习资料。通过查线索，搞调研，我对疑似麻风病人取标本，作抗酸染色寻找麻风杆菌，把确诊的麻风病人送到鹿寨山隔离区的草棚里居住治疗。

这一年的秋季，桂林地区卫生科通知，要各县把确诊的麻风病人送到桂林麻风病医院去。我奉县医院领导的指示，负责转送麻风病人。我带着选送的 6 名很典型的疣型麻风病人，到火车站乘上联系好的货列，凌晨在桂林南站下车，然后徒步到临桂大圩镇山边野地住宿进膳。次日凌晨又动身赶路，因为路途不熟悉，直到晚上才走到桂林麻风病医院。医师对病人确诊后，安排住院。该院领导对我说，我送来的病人无一例是结核病例，这说明还有漏诊漏送病人，要我们再补查补送。还嘱咐我，以后送病人可在桂林转船直达草坪上岸，按路标行走，半日即可到达。

回县后，又经过调查，确诊了疣型麻风病 3 例，结核型麻风病 7 例。1954 年秋天，我再次把麻风病人送往桂林麻风病医院，由于路径熟了，一路上减少了许多麻烦。

后来，我县在四排乡吉云村三帽岭也建立了“麻风村”，1960 年 7 月 16 日首次收容住院病人。当天，我也参加了对 15 位麻风病人的护送。

可以说，在我们县，我是第一个检送麻风病人的医生。

县医院下设四个分院的历史背景

●韦德昌

1959 至 1961 年，我国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缺吃少穿，一些地区甚至到了吃草根、啃树皮都无法生存的地步。人们严重的营养不良，浮肿、干瘦、妇女子宫脱垂、小儿营养不良等“四病”（亦称“新四病”）在全国大范围出现，严重地危害人民健康乃至威胁生命。党中央、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号召全国人民自立，自强，自力更生，努力发展生产，尽一切努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减少疾病，共度难关。各级党委、政府把抗病救灾这一头等大事纳入议事日程，调配人力、物力、财力，普救众生。

当时，鹿寨县委书记史文、县长韦颖、副县长吴以基、县委宣传部长李绪正、卫生局长汤英能等领导同志坐镇卫生部门，决策布署，指挥全县“新四病”防治工作。

据 1961 年 3 月 13 日的不完全统计，全县有“新四病”患者 10724 人，总患病率为 5.03%，其中浮肿 2389 人，干瘦 6209 人，子宫脱垂 1642 人，小儿营养不良 484 人。由于“四病”发病率高，来势凶猛，且分布面广，病死率高，仅靠县医院的 60 张病床收容住院，根本无法满足事态发展的需要。

为解决这一刻不容缓的问题，争分夺秒地抢救病人，提高治愈率，减少死亡率，尽快控制“四病”的发生和发展。县委决定：在人口密度大，而且相对集中的四排（含头排）、寨沙（含拉沟）、雒容（含江口）、中渡（含平山）等 4 个公社，与当地卫生院合并建立 4 个县医院下属分院（城关、城镇、黄冕 3 个公社的病人直接送医院）；任命县医院秘书韦德昌为四排分院院长，任命寨沙区党支部书记文荣桂为寨沙分院院长，任命县防疫站廖建桃为雒容分院院长，任命县医院检验科主任王金恒为中渡分院院长。又从县医院、县防疫站、柳州市人民医院对口支援鹿寨医疗小分队、广西医学院、广西中医学院赴鹿寨实习医生的一大批医疗骨干中充实到 4 个分院，还从县文工团、县小、县糖厂、县砖瓦厂抽调几十名女共青团员，经过短期医疗技术培训，担任护理人员，分配到 4 个分院。

4 个分院的建立，不仅缓解了县医院的压力，更能及时有效地就地收治“四病”患者，为抢救垂危病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全县迅速降低“四病”发病率，严控病死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县广大医务人员的艰苦奋斗和共同努力，据截至 1961 年 11 月底的统计，全县“四病”发病率、死亡率已得到有效控制。

1962 年上半年，县医院下属的 4 个分院在这场历史性的灾难宣告结束时，也同时宣布撤销。

图为鹿寨县人民医院雒容临时分院全体医务工作者合影。



用“大力丸”治疗“新四病”

●刘仕金

1959 年底，“新四病”在我县范围内严重发生。我从县医院抽调到龙江公社卫生所，

协助阳毅夫所长开展大搞中草药防治浮肿、干瘦、困倦病。

经过 10 多天的摸索，我们发觉单独使用五指牛奶、小球藻的治疗效果还并不理想，必须加些黄豆、粳米，效果才好。我们把中草药和黄豆、粳米合理调配，制成药丸，使用效果很好，而且使用也很方便。我们把这种药丸叫做“大力丸”。

不久“大力丸”在全县推广开来，各公社医院都配制了这种“药”，对治疗“新四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我县的首次兵役体检

●廖建桃

1955 年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布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兵役征兵命令，中央军委同时下发了《义务兵员体检标准》，要求全国各地必须按质按量及时完成征兵任务。

鹿寨县也于 1955 年开始了兵役试征，并进行了首次兵役体检。当时，医务人员相当缺乏，医疗设备也很简陋。接受兵役体检任务后，由人民政府卫生科牵头，从县卫生院和各区卫生所抽调了部分医务人员，组成 3 个体检组，由卫生科长孟斌瑞和另一位科员以及县卫生院一业务领导带队，分赴中渡、雒容、寨沙三个区的卫生所，对经各区卫生所初检后的兵源作复检查。当时，我参加的是赴中渡兵役体检组。

兵役体检组全体人员首先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义务兵体检标准》，认真领会此次兵役体检的政治意义，明确了重大责任；对体检标准“吃透、吃深”，要求大家一定要严肃认真地执行，保证兵源质量。

我们组配备了一台老化的显微镜和一部血压计，还有的就是听诊器。医务人员凭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通过“望、闻、问、切、听”的严谨手段，对全县初选的应征报名的适龄青年复检，最后送上了 450 名青年入伍。

我们顺利地完成了首次义务兵员体检的光荣任务，而且无一因体检原因而退兵，受到了柳州军分区和广西军区的通报表扬。

回忆推行新法接生的艰辛岁月

●刘凤珠 口述 / 覃德礼 记录整理

我是 1957 年以卫生系统干部家属的名义，参加鹿寨县第四期新法接生员培训班的。经过 20 天的学习，回到黄冕接生站当接生员。接生站虽然属于公社医院领导，担负着推行新法接生的任务，却是由接生员自由组合，财经自收自支的单位，政府给予适当的补贴。接生员完成任务好的，给予评优奖励。

从前，妇女生孩子，像是过“鬼门关”。不少妇女死于产程或“产褥热”，而婴儿则死于“破伤风”（俗称“三早风”、“七早锁”）。黄冕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生儿育女人人盼，母子同过鬼门关；娘死月中儿风锁，全家痛哭泪涟涟！”其悲惨情景令人心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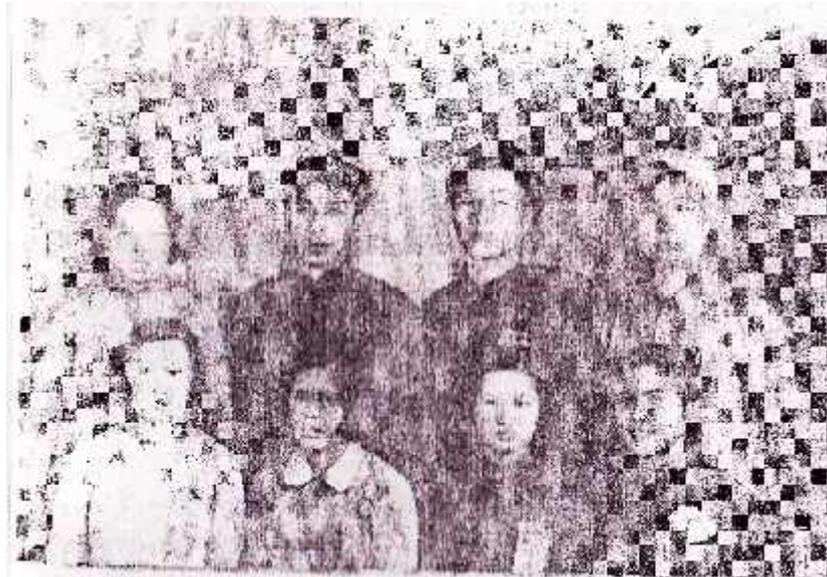
建国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母婴安全。鹿寨县于 1952 年 10 月和 11 月，先后开办了新法接生员培训班。1956 年妇幼保健站成立后，重点任务是推行新法接生，为各级农

业合作社培训接生员，并免费给接生员配备一套药械俱全的接生袋。到 1958 年底，全县共培训接生员 161 人，平均 1000 人口有 1 名接生员。当年的新法接生率上升到 60.16%。

想起当年推行新法接生，那种艰辛，的确难以言表。我刚参加工作，就面临着三大挑战。首先是政治压力。那时，政府推行新法接生，当作是一项改造社会，造福人民的“政治任务”，医务人员必须以“彻底革命的精神”来完成，万一出了差错可不得了，所以政治压力很大。其次，封建迷信势力根深蒂固，百般阻挠。人们普遍认为，女人生娃仔是一件见不得人的带秽气的大丑事。千百年来，农村的老百姓都由不懂得消毒的接生婆来接生，惯用锈剪或瓦片割新生儿的脐带，哪怕是造成死亡也认为是天意和命中注定，不理解 and 抵制新法接生。再有呢，我们这些接生员是已婚的妇女，多数都有儿女，有的正身怀六甲，加上农村交通不便，为去接生，要扛着大肚子或背着嫩仔，顶风冒雨或是顶着烈日曝晒，步行十里八里，甚至二三十里，那个辛苦可想而知。

记得 1958 年寒冬的一个雨天，爱国大队的干部来电话说，有一个瑶族产妇已一天一夜生不下娃仔，请求抢救接产。我二话没说，挎上接生箱，背上只有 4 个月的嫩仔就出发了。一路上寒风冷雨，跋山涉水，山路又崎岖难走，紧跑慢赶，硬是走了 3 个多小时才来到波门村那个产妇的家。刚到她家门前，却被一帮妇女拦住了，死活不准我进屋接生。这时我又冷又饿，儿子也饿得冷得不停地大哭。我好不伤心，本想一走了之，可神圣的职责不允许我这样做啊！经过我的一番宣传和队干的努力调解，主家才答应我帮接生。可是，他们还是不让我立即进家，直到一个老妇人端来一盆用柚子叶、秽草、樟树皮熬的热水，将一块烧红的铁板丢进盆里，用冒出的蒸汽绕着我俩娘仔身边熏了十多分钟，说是解秽祛邪后才让我进屋。当我进到产妇的房里，惊心动魄的场面出现在我的眼前——产妇光着下身，坐在床前一张凳子上，面前是一堆浸湿了的草木灰。产妇脸色惨白，呼吸浅急，哭喊声急速而又微弱，已经出现了病危体症。经过一番动员说服后，主人才同意将产妇放到床上躺下。当时的产房是关门闭窗的，“解秽”的蒸汽弥漫在屋子里，而屋外“赶鬼”的鸟炮不时鸣响。我给产妇讲清了产程的正常现象和规律，教她如何运气用力，又让主家给她鸡肉粥进食添力……经过两个多小时，她总算平安产下了一个健壮的男婴。主家的人全都欢喜若狂，门外的道贺声也连接不断，真个是喜气盈门！事后，主家杀鸡宰鸭，弄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席间，主人提出，让孩子认我做契妈。我考虑职责在身，担心影响不好，婉言谢绝了。饭后，主人牵来一匹大马，把我俩娘仔送回了黄冕。

忆当年，虽苦犹甜。在全县医务人员和农村接生员的共同努力下，鹿寨县的新法接生工作可用“突飞猛进”来评价。据 1959 年的年终统计，全县共有接生员 226 人，全年出生 4218 人，新法接生 2706 人，新法接生率为 64.11%，全年无产妇和新生儿死亡。我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集体生活福利事业积极分子”，并到南宁参加了代表大会。



图为 1959 年 1 月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集体生活福利事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鹿寨县全体代表合影。前排右二为刘凤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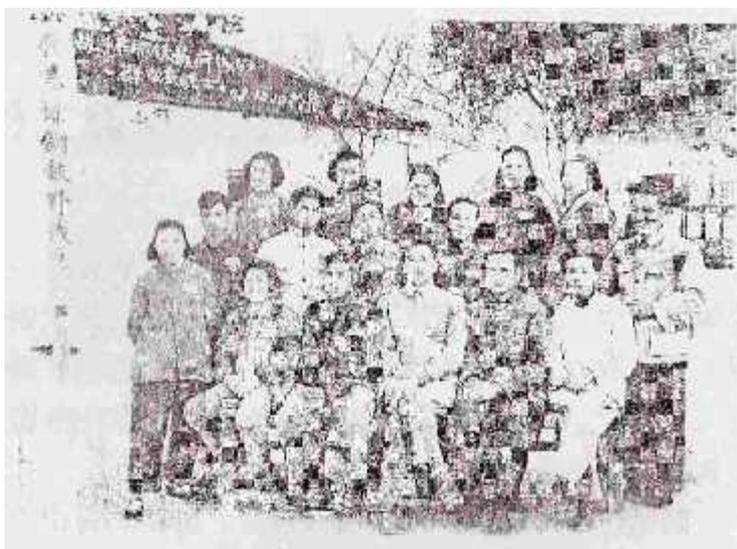
鹿寨县“钢铁野战医院”

● 韦德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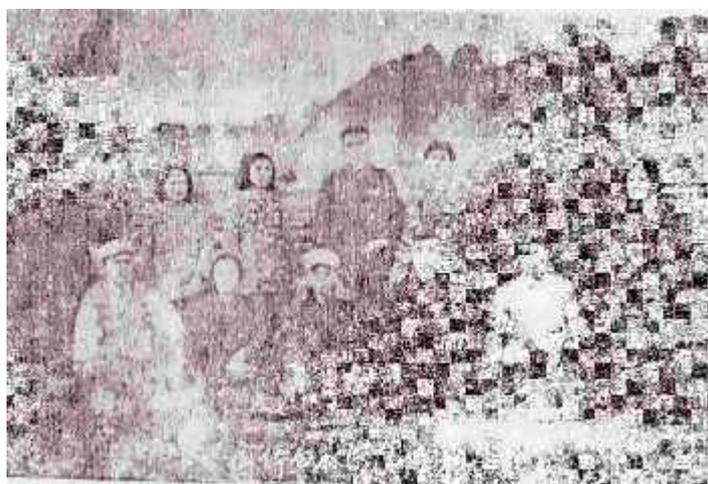
1958 年全民大办钢铁，仅我县就有“钢铁大军”近 10 万人。“钢铁战士”们日以继夜奋战在英山（中渡）、黄腊、高坡、大阳、屯秋等“钢铁基地”上。

为了做好这支“钢铁大军”的医疗保健工作，鹿寨县委、县政府决定：从县直属医疗卫生单位及部分驻县的自治区、地区厂、矿、场医院抽调 60 余名医护人员组建县“钢铁野战医院”；指定县卫生局长汤英能坐镇医院加强领导和管理，任命县医院党支部书记宇勇为院长，韦德昌为秘书。医务人员有：廖建桃、陈庆文、农秀英、李开鑫、李少芳、覃佩芬、陈秀英、覃用矩、孙玉珍、廖惠莲、钟素英、张桂娟、谢金贤等。

“钢铁野战医院”下设 6 个小分队，每队 3~6 人，直接深入各“钢铁基地”，为这支“钢铁大军”开展医疗保健服务。他们和“钢铁战士”一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钢铁元帅升宝帐”日夜苦战；蓝天当被，大地当床，常常是“早饭到晌午，晚饭到更鼓”，许多医务人员带病工作，不下“火线”，不怕苦，不叫累。大办钢铁结束时，笔者和 10 余人被授予“钢铁模范”称号；县“钢铁野战医院”被评为“先进集体”。



图为 1958 年摄于英山的一群“战斗在钢铁最前线的一群白衣战士”。



图为 1958 年“太阳铁厂全体白衣战士胜利合影”。
(图片由廖建桃同志提供)

黄腊“炼铁基地”的医疗保健工作

●邵世周

1958 年全民大办钢铁期间，黄腊是鹿寨县的一个重要炼铁基地。这里，有来自鹿寨、柳江、宜山的“钢铁野战大军”数万人，分为炼铁、烧炭、挖矿、运输、后勤保障五个部分。“前线钢铁指挥部”就设在这里，由鹿寨县县长潘桂达兼任指挥长。

前线指挥部决定，把支前的鹿寨、柳江、宜山卫校、宜山中医院的随队医务人员 20 余人组织起来，成立“黄腊钢铁前线医院”。指挥长潘桂达任命我为医院院长。

当时，由于炼铁、烧炭、挖矿三大工种劳动强度大，危险性大，又是野外露天作业，加上各项防护措施不完善，所以前期跌伤、虫叮蛇咬等外伤病员日渐增多；后期则因经

过一段时间的“大干、苦干、拼命干”，劳累疲惫，体力普遍透支，免疫力下降，各种疾病发病率明显上升，病员也日渐增多。伤病员源源不断地送到临时医院，然而医院因经费不足，药品器械奇缺，制约了医疗保健工作的开展。面对困难，大家出谋献策，群策群力，决定充分运用“一根针、一把草”这一传统医学瑰宝，就地取材，向大自然取宝，利用中草药开展医疗保健，为炼铁基地前线输送劳动力。

医护人员利用每天巡回出诊的机会，一肩背药箱，一肩背药篓，边采药，边看病。大家把采回的草根树皮加工成膏丹丸散，保证了临时医院的用药需要。临时医院的壮举，曾多次得到了钢铁前线指挥部的表彰。

（韦德昌 整理）

建国十周年赴南宁参观团

●李开鑫

1959年10月，鹿寨县卫生局组织全县卫生系统的代表赴南宁参观国庆十周年医药卫生展览会。我是其中的一员，曾赋诗一首以纪念：

建国经历已十年，
地覆天翻换新颜。
工业腾飞超纪录，
农村跃进步桃园。
医疗保健皆周到，
教育文化都领先。
一派繁荣新景象，
苍生作主掌全权。



（图为参观团代表合影）

从一张老照片勾出的记忆

●路 德



我近来清理旧照片，发现这张 1953 年鹿寨县青年团干部的合影。因年代较久，保管不善，照片中的人员相貌模糊，个别人已辨认不出姓名来了。我翻开《鹿寨县组织史资料》（以下简称《史料》），企望能从中弄清照片中人员的姓名。谁知，我失望了。这《史料》中，只记述了团县委正、副书记的姓名，而对其他专职团干和区、镇团委会的副书记，均没有记述入册。

解放初期，绝大部分年轻干部尚未参加共产党组织，许多人被安排在区、镇团委会任副书记或专职干事。当时，全县区、镇团委会的书记均由区委书记、副书记或区委委员兼任。我自 1951 年三县合并时就在鹿寨县第五区担任团委会副书记，1953 年调任团县委秘书，直到 1958 年大办钢铁运动时，抽调到英山铁厂工作，但仍分担青年工作的报导任务，是青年报的特约通讯员。像我这样从事专职团干工作的许多同志，而且从事专职团干工作多年、甚至达 10 年之久的一些同志，在《史料》中均没有记载，不能说不是一件遗憾的事！

对着这张旧照片，我久久凝思，渐渐地从左到右，排列出了照片中人员的名单。他们是——

第一排：张秀琼 韦於兴 潘世强 赵 卞 何曙云

第二排：xxx 谢 仁 李焕乾 潘桂达 彭世能

第三排：庞璧彰 路 德 莫 杰 莫崇贤 萨玉贵

（注：第二排左起第一人，因年代久远，已记忆不清，像是谢焱光）

为了弥补《鹿寨县共青团史料》的缺陷，客观地记述史实，我经过一番仔细的回忆，凭着自己的记忆，列出了上世纪 50 年代各区镇专职团干的名单：

一区（今黄冕）：李焕乾、秦贵明；
二区（今中渡）：李绪正、胡纯益、龙大伟；
三区（今平山镇平山片）：杨代富、谢焱光、杨胜德；
四区（今平山镇屯秋片）：彭世能、蒋向阳；王清廉
五区（今鹿寨镇）：路德、罗涛、韦在绪；
六区（今雒容）：莫杰、刘梦奎、欧奇才；
七区（今导江、江口）：庞璧彰、韦斧刚、杨如德；
八区（今寨沙镇龙江片）：莫崇贤、王均彪；
九区（今寨沙镇寨沙片）：韦任良、谢仁、郭云、黄万忠、邓贵崇、刘德超；
十区（今四排）：段四新、李华堂、潘明忠；
十一区（今头排）：李渊华；
鹿寨镇：潘世强。

曾任团县委书记或副书记的同志有：潘桂达、肖一言、莫崇贤、杨代富、李绪正、段日新、彭世能、余桂贤、潘邦福、何曙云、张龙富、黄大寨等。

此外，赵卞、萨玉贵、张秀琼、韦於兴、路德、吴大萃、娄景文、沈光明、李焕乾、郭云等同志均在团县委任过职，至于他们所任职务和任职时间，因年代久远，已记不清了，当以档案材料为准。从一张老照片勾出的记忆，也许难免错漏，期望知情的老同志加以补充和指正。

◆ 文物古迹 ◆

再话洛容“平蛮碑”

● 黄小斌

“蛮”，是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侮称。平蛮碑，即封建统治者“平蛮”战役后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庆功碑。鹿寨县中渡镇旧县村旁（旧时洛容县所在地）的铜盆山上，有两方人工磨平的巨大石壁，分别为一大一小的“一方保障”摩岩石刻。这就是明朝年间留下的洛容“平蛮碑”。

大的“一方保障”，详刻着与此次平蛮事件的相关碑文；高3.2米，宽约3米，竖行排列，计27行，满行为18字，字径9厘米。“平蛮碑”上方“一方保障”四个大字，为马龙川书写。左侧小的“一方保障”，是隆庆辛未年（1571年），奉勒分高肇左参将在该处游玩时留下的诗文。它高82厘米，宽120厘米，字径6厘米。在“平蛮碑”右侧还有三方小碑刻，即：参将王世科的原韵碑，参将马良江及参将黄应甲的和韵碑。（王世科、马良江、黄应甲三人，均为明代万历年间镇压壮、瑶少数民族起义的广西总兵官俞大猷手下的参将。）

明朝中叶，广西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令执政者大为震惊。万历二年（1573），朝廷指派两广总兵官俞大猷（福建晋江人）负责岭南地区“平蛮”，调集广西左、右江及湖、浙官兵10余万人，分两路汇合于桂林。在桂林经过半年集训后，率部朝古田（今之永福县）顺洛清江而下，妄图一举歼灭怀远、洛容、柳城、永福、阳朔等地的壮、瑶农民起义军。在途经古田时，遭遇覃万贤、韦银豹所部义军的奋勇抵抗。但由于义军兵寡器

劣，最终退至洛容县境内（今之中渡、平山境内）。

退到洛容境内的农民起义军与当地少数民族再次抵抗，终因朝廷大军突然压进，起义军力量悬殊，经过半年的殊死搏斗，于万历元年（1571年）腊月，覃万贤、韦银豹在激战中被俘，被解往京城杀害。随后，韦银豹的子女七人也相继被捕遭害。在此期间，韦银豹余部，仍转战于桂北、桂中等地，与远在大藤峡（今之桂平境内）的农民起义军及当地的壮、瑶少数民族一道，浴血奋战。其参战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久，在我国少数民族斗争史上是少有的。

“一方保障”，就记载着明朝统治者镇压少数民族农民起义的“丰功伟绩”。与此同时，这些镇压岭南少数民族的明朝将领们，为炫耀其战功，镇慑百姓，还在距洛容“平蛮碑”一公里的一处孤石上（其状若马鞍，重约10吨，于农业学大寨期间被毁），刻上“京观”二字（字为70×70厘米），左侧刻有：“平定洛斗下半团叛乱，斩首五百余级。大明万历三年书”。据考，在我国古代有一项不成文的交战惯例：战胜一方将战败一方阵亡者尸体堆集起来，夯土盖实，形成一个大金字塔形的土堆，号为“京观”。

“一方保障”和“京观石”，佐证了壮、瑶农民起义顽强斗争的英勇气概，为研究明朝统治者与岭南少数民族关系，考证桂中境内农民起义，提供了重要的史实依据；同时对研究不同时期的军事、政治、民族史，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图为洛容“平蛮碑”（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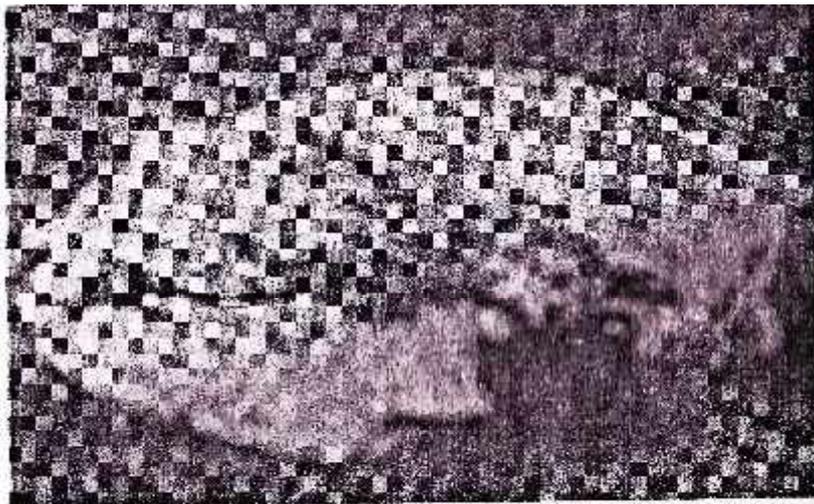
巴敢岩奇境

●李宝璜

鹿寨镇龙田村巴敢屯有一个很有名的岩洞，叫巴敢岩。岩由东、北、西面数个山脉形成，整体外形酷似一张靠背椅。岩的正面即南面，是一片开阔地。岩口成拱形，高约 8 米，深约 10 米。岩内正面约有 15 平方米，成阶梯陡形。岩内正北面是一个长约 25 米、宽约 1 米的遂洞，由岩口上端钻进去可直达岩顶。登上岩顶，举目四望，群山连绵，景色如画。

令人叫奇的是，岩内的东面，是光滑锃亮的石壁，用手轻击壁面，发出阵阵响声。岩底是个深约 10 多米、宽约 8 米的渊洞。洞里，有螺蛳状大大小小的石头及各种兽形镶嵌其间。洞底有天然的石柱、石桌、鼓形石凳。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两个仙翁在石桌上下棋，每人身边原先摆放着 60 个仙桃，一年只吃一个。两位仙翁已经吃了 59 个。这天，一只獐子被猎人追赶，窜进岩洞，跌入岩底，打翻了棋盘，棋子变成了数块石板。仙翁无法下棋，出了岩洞，对猎人说：“你追赶的獐子再也起不来了。我们下了五十九年棋，你也在这里守五十九年吧！”说完，化作两缕青烟隐身而去。猎人好生惊奇，想到岩里看个仔细，不想走进岩口就走不动了，趴在岩坎的石壁上被巴住了。从此，人们把这里叫“巴敢岩”。至今，当你步入洞口时，仍然可以见到一个石头人立守在洞口，犹似一夫当关。

1980 年，岩顶滚落一块 1 吨多重的大石块。石块中有大熊猫、鹿、狮等动物化石。经广西自然博物馆专家对化石初步认定，其中主要有 20~30 万年前的西藏型黑熊完整的头骨化石，为考证鹿寨地区动物及人类进化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西藏型黑熊头骨化石